

乾隆朝《職貢圖》的西域成員構成 與西征準噶爾後的西域表述*

林士鉉**

摘 要

本文以乾隆朝《職貢圖》卷一為核心，考察其中西域成員的構成與排序，尤其關注伊犁厄魯特群組與回部諸城的關鍵地位，並探討原應歸入八旗、藩部而非傳統職貢範圍的成員如何被納入職貢圖像體系。研究結合《職貢圖》、《平定西域獻俘禮圖》、《萬國來朝圖》與乾隆年間所修《大清一統志》、《御製增訂清文鑑·旗分佐領類》及相關西域輿圖、滿文文獻等材料，透過圖像與文字的對讀，追索西域戰爭後清廷在知識編纂與疆域整合上的操作。本文指出，《職貢圖》卷一所呈現的伊犁厄魯特與回部各城，實際上被收錄於《御製增訂清文鑑》中，成為「平定準噶爾厄魯特」、「平定回子」等條目，顯示其身分已從外國、朝貢國改列為帝國旗屬、藩部，然而在視覺文本的編排上，卻仍被刻意安置於職貢序列之中。這種「越界」編排，使《職貢圖》既延續職貢圖像傳統，又成為書寫平定準噶爾與整併西域的重要歷史文本，標誌清帝國的「西域／內亞轉向」。透過放大伊犁群組與西域諸城在圖像中的分量，準噶爾汗國作為獨立政權與歷史主體被抹消，只能以被內化的旗分與藩部之姿，納入「中國」疆域與帝國記憶之中。

關鍵詞：職貢圖、西域、伊犁、厄魯特、準噶爾

* 收稿日期：2022年11月7日，通過刊登日期：2025年12月19日。

**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一、前 言

清朝的「準噶爾問題」貫穿康、雍、乾三朝，深刻影響其朝政與邊疆政策。乾隆二十年（1755）出兵征討雄據內亞多年的準噶爾汗國，經過歷時五年的戰役，不僅將天山南北納入版圖，也催生出大批論旨、碑文、方略、地志與圖像作品，用以重構西域疆域、族群與清朝之間的歷史與現實關係。正如米華健（James A. Millward）所言，征服西域後，清朝官員與士人已不再質疑西域是否屬於清朝，而是轉而思考如何「整合」西域與中國。¹這種歷史書寫本身，就是清廷構想並實現「整合」的主要場域，且與西域戰爭幾乎同步展開。

乾隆朝《職貢圖》多達三百餘組成員的規模，以及成立過程中的數個關鍵節點，都與用兵西域密切相關。它既是一種特殊的歷史書寫，也是帝國整合工程的產物，因而成為本文考察清朝西域表述轉變的核心對象。

乾隆年間圍繞西域展開的史志與圖像計畫，大致可分為三類：其一，是以《朔漠方略》為前導、記錄用兵準噶爾的《平定準噶爾方略》；其二，是直接以西域為主題的官修圖書，如《西域同文志》、《西域圖志》；其三，則是在既有或新編典籍中增修西域內容，如《職貢圖》、《皇朝禮器圖式》、《大清一統志》，以及以西域為焦點的繪畫、輿圖與《時憲書》中的相關條目。由此涵蓋歷史、禮樂、天文、地理等層面，清廷一方面宣揚武功，一方面反覆強調西域「猶如內地」的政治意圖。然而，這種意圖內含結構性矛盾：《西域圖志》強調西域已在疆域內部，可與都會郡縣並列；《職貢圖》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卻被歸入「外紀」，以職貢、外部的視角定位。²儘管如此，《職貢圖》收

¹ 米華健（James A. Millward）著，賈建飛譯，《嘉峪關外：1759-1864 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頁 51。

² 此處引用《四庫全書總目》對《皇清職貢圖》的提要評語，見〔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 71，史部地理類四，〈皇清職貢圖〉，頁 633-634。另需注意的是，不同版本的《職貢圖》提要分類有所出入，如《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將其列為地理類都會郡縣之屬，見〔清〕傅恆等奉敕撰，《皇清職貢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冊 594，頁 401。

錄的西域成員極多，使清朝管轄下的西域同時呈現「內／外」疊合的複雜狀態，這正為本文理解西域表述的轉折，提供關鍵的切入點。

尤須強調的是，上述著作即使在形式上沿襲傳統體例，卻因納入征服西域的成果，而展現出與前代極為不同的意義。例如，被列入經部小學類的《西域同文志》，名義上是正音正字的工具書，實際內容則以六種語文對應，系統呈現自青海、西藏至天山南北的山川、地理與部族詞彙，將邊疆多語知識提升至經典訓詁的高度；³《皇朝禮器圖式》所收錄的地球儀，不僅標示中國、蒙古、準部、回部及海外諸國，更以北京為標準時間，明示清帝國作為全球時空中心的定位。⁴至於乾隆朝《職貢圖》，表面上承襲自梁元帝系統，實則在藝術與結構上多所創新：畫法上採納西洋技法以強調光影與質感，結構上則以一男一女相對而立的組合呈現多數朝貢成員，而非僅描繪男性使節團。⁵《職貢圖》藉由這些新形式，重新演繹「懷柔遠人」的舊題，並把西洋歐洲與西域內亞並置為兩大關鍵群體，從根本上改寫了傳統職貢圖像的面貌。

濮德培（Peter C. Perdue）指出，清朝征服西域後，君臣積極推動繪製地圖、蒐集資訊與歷史書寫，目的在於「將地方資訊攤開在官方的全面凝視之下」。⁶何蘿娜（Laura Hostetler）則將《職貢圖》視為帝國擴張的透鏡，是清朝征服的再現，亦是征服者的歷史書寫。⁷清宮《職貢圖》大致完成時間接近

³ [清]傅恆等奉敕撰，《欽定西域同文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35，頁 2。

⁴ 關於乾隆年間以地球儀作為禮器的初步考察，參見林士鉉，〈《皇朝禮器圖式》的滿蒙西域西洋等因素探究〉，《故宮學術季刊》，卷 34 期 4（2020 年 9 月），頁 120-124。

⁵ 關於乾隆皇帝如何關注梁元帝《職貢圖》系統，包括對於傳聞立本《王會圖》、傳南唐顧德謙摹梁元帝《番客入朝圖》進行評斷，以及乾隆朝《職貢圖》新形式的特點及由來，詳見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75（2012 年 3 月），頁 25-32。

⁶ 濮德培（Peter C. Perdue）著，葉品岑、蔡偉傑、林文凱譯，《中國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歐亞與蒙古帝國的最後輓歌》（臺北：衛城出版／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1），頁 431。

⁷ Laura Hostetler, "The Qing Court and Peoples of Central and Inner Asia: Representations of Tributary Relationships from the *Huang Qing Zhigong tu*," in Dittmar Schorkowitz and Chia Ning, eds., *Managing Frontiers in Qing China: the Lifanyuan and Libu Revisited* (Leiden, Boston: Brill, 2017), pp. 185-223.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平定回部時，可謂即時性的歷史書寫，⁸體現清朝對新領土迅速的知識性納編。

除了承載「征服者的歷史書寫」，乾隆朝《職貢圖》更以內容上的「西洋轉向」展現帝國的全球視野。賴毓芝以全球史視角指出，圖中西洋／歐洲成員合計達十二組；相較於《明史》或《三才圖會》零散而有限的西洋記載，這種呈現確可視為「勉強放大」，卻也反映出歐洲在清帝國職貢想像中已不可或缺。⁹事實上，其背後承接的是康熙朝敕纂《大清一統志》的嘗試：該書在外藩諸國中，除荷蘭、佛郎機等個別條目，更以「西洋」立為總目，依利瑪竇《萬國全圖》略述五大洲，並臚列西把尼亞、拂郎察等七十餘國的歐洲朝貢清單。¹⁰重點在於，乾隆朝《職貢圖》進一步以圖像、圖說將這一「西洋」條目拆解為十二組篇目，無論在篇幅或細緻度上，都遠超《大清一統志》的清單式文字排比。

清朝的「天下秩序」體系以皇帝為中心，由內地、邊疆、藩部層層向外推進，最終納入屬國與外洋之國。¹¹此秩序清晰投射在史志與圖像的地理序列上：《大清一統志》由內而外鋪陳，清宮《職貢圖》則採自外而內的排序，自朝鮮以下外國，次及內陸亞洲，最後才列各省邊民（番人、番民）。在成員收錄上，《職貢圖》亦遵循一套排除原則：不列入漠北（喀爾喀）、漠南諸蒙古，因其已為藩部、盟旗成員，非當時職貢屬邦。¹²

⁸ 清朝與準噶爾關係的歷史書寫研究，除前引濮德培專著外，尚可參考沈雪晨，〈事實與書寫——雍正乾隆時期清準議和再論〉，《新史學》，卷 32 期 4（2021 年 12 月），頁 181-240；馬子木，〈乾隆朝初通巴達克山考——兼論準噶爾遺產與清朝中亞外交之初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88 本第 2 分（2017 年 6 月），頁 347-396。

⁹ 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75，頁 32-38。

¹⁰ 〔清〕蔣廷錫等奉敕撰，《大清一統志》（清康熙二十五年敕纂，乾隆八年成書，乾隆九年武英殿刊本，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外藩（朝貢）諸國，卷 353-356。此份朝貢國清單首列朝鮮，末位為佛郎機。其中「西洋」見於卷 355，頁 14a-21b。

¹¹ 尤淑君，〈賓禮到禮賓：外使謁見與晚清涉外體制的變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頁 57。

¹² 清代「外藩」一詞概念指代範圍鬆散，一指版圖內的各藩部（外藩蒙古回部），二指與清國有宗藩關係的屬國，三指所有與清朝發生關係的外國；而理藩院兼掌藩部與部分屬國事務。關於清代的藩部、屬國等涉外關係及體制、概念，另參見張永江，〈清代藩部研究：以政治變遷為中心〉（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1），頁 20、31-32。

然而，與此原則對照，便可看出清宮《職貢圖》對內亞成員的特殊處理。如果說西洋成員是「勉強擴張」出來的，那麼卷一中緊接西洋之後的內陸亞洲（內亞）成員卻顯然不同：西藏、伊犁、土爾扈特等群組合計四十三組（參見附表 1），其中僅西域成員（伊犁、哈薩克、布魯特、烏什等）即達二十四組，數量超過西洋一倍，已非單純「放大」所能概括。這些成員群組（如西藏、伊犁、土爾扈特）緊接西洋成員之後，被統稱為「內亞」（Central and Inner Asia）群組。¹³更重要的是，這些群組有些是清朝藩部，有些則是藩部之屬國（部），卻在圖中被刻意放大為擁有四、五個篇目的「群組」，直接打破了原本排除藩部成員的原則。這種一方面視內亞成員為「內部藩部」，一方面又作為「外部職貢」來處理的張力，正是本文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對此特殊現象，學界已有重要的分析。何蘿娜即以內亞為範圍，翻譯並討論包括西藏、西域群體在內的《職貢圖》圖說內容，顯示這些「內亞群體」具有的關鍵意義。¹⁴齊光也指出，《職貢圖》中西藏、伊犁地區厄魯特、回子圖說的滿、漢文用字有所不同，¹⁵顯示從滿文與內亞視角討論清宮《職貢圖》「非職貢」本質與其重要性。曲強則以回疆範圍的三組圖為例，指出畫片的收錄、

¹³ 內亞（包括中亞、南亞）藩部的屬國（部），是指雖列入屬國名單，但反而和清朝藩部發生政經關係的邊外部落或小國。在中亞地區屬於回疆藩屬者，包括：浩罕（及其所屬的那木干、安集延、瑪爾噶朗等城）、愛烏罕、巴達克山、塔什干、坎巨提、博羅爾等等；南亞地區主要是西藏的屬部，主要有拉達克、巴爾提斯坦、布魯克巴、哲孟雄、洛敏湯、作木朗等，參見張永江，《清代藩部研究：以政治變遷為中心》，頁 45-50。藩部的屬國（部）有不少成為乾隆朝《職貢圖》的內容，但並非全部收入，當時為何不更大幅度地擴張中亞、南亞成員，留待另文討論。

¹⁴ Laura Hostetler, "The Qing Court and Peoples of Central and Inner Asia: Representations of Tributary Relationships from the *Huang Qing Zhigong tu*," in Dittmar Schorkowitz and Chia Ning, eds., *Managing Frontiers in Qing China: The Lifanyuan and Libu Revisited*, pp. 185-223; Laura Hostetler, "Central Asians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Qing Imperial Illustrations of Tributary Peoples," in Nile Green, ed., *Writing Travel in Central Asian Hist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89-112.

¹⁵ 齊光，〈解析《皇清職貢圖》繪卷及其滿漢文圖說〉，《清史研究》，2014 年第 4 期，頁 32-34。齊光指出，伊犁蒙古、土爾扈特蒙古與建立清朝的漠南蒙古不同，故被列入《職貢圖》。筆者認為，此一現象更反映清代蒙古實歷經了「去職貢」的過程，反觀被列入《職貢圖》的蒙古，實屬刻意為之。

移置與重要成員缺佚，反映各地與清朝歷史關係及職貢經歷的差異，顯示近期研究進一步轉向成員排序與書寫的政治性意涵。¹⁶

綜合上述研究成果，要理解乾隆朝《職貢圖》複雜的製作過程與版本現象，卷本第一卷的製作與理念是關鍵。此卷作為帝國意象的核心（其內容在刻本與《四庫》寫本中析分至卷一、二、九），其中冠稱「伊犁」的群組，不僅異於以國名、部名、族稱為篇目的成員，也不同于回疆諸城。本文主張：釐清《職貢圖》卷一西域成員的構成，尤其是「伊犁群組」的定位與身分矛盾，是解讀清朝征服西域後知識表述轉變的關鍵。換言之，在乾隆朝《職貢圖》的知識秩序之中，準噶爾作為一個政治主體如何被消隱、拆解與重組，並轉化為帝國西域圖像的一部分，而成為「消逝的存在」？本文將探討此一核心問題，追問《職貢圖》納入這些非傳統職貢成員，如何反映清朝將西域整併入帝國版圖的過程，並透過圖像與文字配合，為征服史定調。

為此，全文將依次展開幾個層次的論證。首先，回顧乾隆朝《職貢圖》的成立過程，指出清朝在西征未竟之時，即增繪以伊犁厄魯特蒙古為首的新西域成員，由此釐清整體西域成員的組成邏輯。其次，透過比對《職貢圖》圖說中的稱謂與分類，解析西域成員在官方知識系統中的身分矛盾。再次，並讀《職貢圖》與《大清一統志》、《御製增訂清文鑑》等文獻，說明這些因用兵西域而增修的文本，如何以清單形式重寫朝貢國、藩部與內附群族，使圖像中的準噶爾衛拉特被隱晦化，幾近消逝，卻又在詞書中被固化為永遠的「被征服者」。最後，討論《職貢圖》西域成員圖像如何延伸至《萬國來朝圖》、《平定西域獻俘禮圖》及《新疆總圖》等作品，勾勒其圖像脈絡與空間宣示意圖。

本研究不僅重新詮釋了《職貢圖》的功能，更揭示清帝國如何運用文化與知識工程，將武力征服轉化為持久的思想與視覺整合，並為理解國家實踐層面的「大一統」概念，提供一個關鍵的歷史案例。

¹⁶ 曲強，〈《皇清職貢圖》所見清朝對回疆地區的認知與書寫〉，《漢學研究》，卷 44 期 1（2026 年 3 月），頁 71-98。

二、以職貢圖之名——「西域」與乾隆朝《職貢圖》成立

（一）圖像計畫的啟動與名稱的轉折

現存清宮《職貢圖》形式與版本眾多，包括卷本、冊頁本，以及四庫寫本、內府刻本《皇清職貢圖》等。經莊吉發、畏冬、賴毓芝等學者深入調查，已大致釐清其極為複雜的成立過程與版本關係。¹⁷《職貢圖》編纂計畫啟動，約始於乾隆十四年（1749）平定金川之後，乾隆皇帝開始密切關注西南族群。隨後計畫範圍迅速擴大：乾隆十五（1750）年八月十一日，四川總督策楞最早接獲諭旨，命其圖繪西番、猺獞男婦形狀；乾隆十六年（1751）閏五月初四日，又以寄信上諭將徵集範圍擴及全國各邊省；同年六月一日，再由軍機處統籌發放標準樣張及上諭至各邊省督撫，並交付內務府畫院照樣繪製。¹⁸因此，清代官書皆以乾隆十六年為正式敕纂時間。

《皇清職貢圖》四庫提要記載：「以朝鮮以下諸外藩為首，其餘諸藩〔番〕、諸蠻，各以所隸之省為次。」¹⁹此體例說明了清宮《職貢圖》的分卷結構與成員範圍：彩繪本第一卷收錄朝鮮、諸外國以及西藏、西域等，可視為「外藩」；第二至四卷則以各省為單位，將其餘蠻番邊民族羅列繪圖，並附圖說。這些邊民圖繪多為一男一女的組合，亦有少數例外。²⁰

¹⁷ 參見莊吉發，《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9）；畏冬，〈嘉慶時期《皇清職貢圖》的再次增補〉，《紫禁城》，1993年第1期，頁44-46；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75，頁2-4、6-16。

¹⁸ 參見莊吉發，〈謝遂《職貢圖》研究〉，《清史論集（二）》（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頁431-433；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75，頁6-8。

¹⁹ 《四庫全書總目》，卷71，史部地理類四，〈皇清職貢圖〉，頁633。此處「其餘諸藩」，參照《皇清職貢圖》圖說的用詞，如彰化縣內山生番、臺灣縣大傑嶺等社熟番等，均使用「番」，而非「藩」。

²⁰ 例如，卷本卷一的巴勒布大人，應是二名男性使臣；卷二關東群組中的赫哲，多了一位正在剝製魚皮的男性等。

回顧《職貢圖》計畫的重要轉折，除圖像蒐集目標由四川擴大至包括外國與全國邊省外，西域戰爭的影響更為關鍵。乾隆二十二年（1757）第二次平定準噶爾戰爭結束，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回部戰爭告終。²¹戰爭促成《職貢圖》多次增繪、補繪，並推動作品名稱由反覆出現的「番圖」、「職方會覽」，最終定名為「職貢圖」（或「皇清職貢圖」）。

（二）「重譯共球」的圖像理念溯源

1. 「重譯共球」作為傳統與創新的連結點

「職貢圖」作為畫題，本身承接傳統的天下觀。相較於歷代職貢圖像，清宮《職貢圖》的新形式與新格局已遠超以往，但在命名理念上依然與傳統相連。乾隆皇帝在《職貢圖·御製詩》中明言，此圖典型取法古代名家畫卷：「唐家右相堪依例，畫院名流命寫真」，²²即以相傳為閻立本的《王會圖》為可循之先例。

同時，乾隆皇帝在《王會圖》引首所題「重譯共球」，強調必須透過多種語文翻譯才能溝通。²³對朝貢諸國、諸部而言，清朝現實世界中的西洋、西域等外賓，都可納入「重譯共球」的構想之內。其中，清朝對西域及其周邊的外交與訊息蒐集，更展現出高度複雜的多語操作。²⁴例如，愛烏罕前來朝貢時，不僅立即補繪入《職貢圖》，乾隆皇帝並作御製識語，稱該部距拔達克山尚三月餘路程，遠在伊犁數千里之外，「重四譯始達」。從滿文理解，即需動員通曉四種語言的通事人員，方能完成溝通。²⁵清朝對中亞、南亞的訊息掌握，確實仰賴多語、多層次的重譯：來自拉達克的資訊需經西藏地方政府轉報，歷經

²¹ 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頁 48-59、94-98。

²² 莊吉發，《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頁 38-39。

²³ 〔唐〕閻立本，《王會圖》卷，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畫 00137900000。

²⁴ 「重譯」和清朝官方強調的「同文」，均是透過翻譯而互通聲息。清朝官方為不同目的編纂多種語文並列之為對譯圖籍，例如，乾隆十五年奉敕撰《欽定同文韻統》六卷，乾隆二十八年敕纂《欽定西域同文志》。

²⁵ 莊吉發，《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頁 152-153。「重四譯始達」，滿文拼音：duin hacin i gisun ulhire hafumbukū be baitalame teni hafunjime mutembi。此處並未明確表達是需要一位通曉四種語言的通事，抑或所需通事人數，而且也沒有具體說明是哪四種語言。

藏文、蒙古文、滿文等層層翻譯，方能奏抵北京。²⁶由此可見，乾隆朝《職貢圖》的成立，一方面繼承古代「王會」體例，一方面也反映清朝在征服西域後，在外交與邊疆治理上對「重譯」操作的重視。

2. 三代理想與藩部現實：「萬國來朝」的想像與成員構成

《職貢圖·御製詩》還援引夏禹、商湯等三代典故，將萬國來朝的想像與三代相連：「塗山玉帛千秋述，商室共球百祿臻」，指涉夏禹、商湯的四海疆域與「共球」意象，典故出自四方諸侯獻貢美玉。²⁷賴毓芝指出，宣稱為徵實之作的彩繪本《職貢圖》第一卷，其意圖與《萬國來朝圖》相同，皆在構築帝國理想。²⁸

然而，現實中同時到紫禁城進見的使臣數量，與此理想圖景存在落差。以乾隆五十五年（1790）正月紫光閣賜宴為例，在場內外藩邦包括蒙古王公、回部伯克，以及朝鮮、安南、琉球、暹羅、廓爾喀五國使臣。²⁹御製詩注亦說明，各國依期入貢，使臣難以同時到場，但因此次四國使臣「適會共球」，乾隆皇帝遂自誇「自古王會開圖，未能有此鉅觀也」。³⁰此處使用「共球」一詞，顯

²⁶ 孔令偉，〈拉達克與清廷情報文書的傳譯過程〉，《中國藏學》，2019年第3期，頁114-124。

²⁷ 莊吉發，〈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頁152-153。「塗山玉帛千秋述」，典故引自《左傳·哀公七年》「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參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0），冊4，頁1642；「商室共球百祿臻」，「共球」一詞，清代君臣在職貢相關的詩句中多次引用，賴毓芝認為是康熙皇帝接受西方地圓說後，改寫傳統職貢語彙後才出現的新詞彙。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75，頁26，注82。筆者認為共球一詞乃出自《詩經·商頌·長發》，以「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彪」為首的二句，而將小球大球，小共大共結合為「共球」；這二段詩句也包含了「百祿」一詞。歷來訓詁將球訓玉，共訓法，參見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一版三刷），頁782。進一步參考御製詩「共球」的滿文翻譯，指的是玉磬（gu i kingken）；另參照乾隆年間的滿文本《詩經》，球，gukio，美玉；共，albabun，貢品。因此，乾隆朝臣應將共球理解為來自四方諸侯的獻貢和美玉。參見清高宗敕譯，《御製繙譯詩經》，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85，卷8，頁59a-60a。

²⁸ 賴毓芝，〈構築理想帝國：《職貢圖》與《萬國來朝圖》的製作〉，《紫禁城》，2014年第10期，頁56-69。

²⁹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1346，乾隆五十五年正月丁亥（六日），頁7。是日乾隆皇帝還召集大學士、內廷翰林等，舉行茶宴，以八徵耄念之寶聯句賦詩。

³⁰ 此詩注出自〈新正重華官茶宴廷臣及內廷翰林用八徵耄念之寶聯句復得詩二律〉，其中「介眉四國產呈繄」句注云：「《會典》載，朝鮮國每年遣使入貢，琉球國間歲一貢，安南、暹羅二

示清朝將各國使臣偶然同時到場的罕見盛況視為萬國來朝理想在現實中的極致實現。

另一方面，現實也揭示《職貢圖》收錄原則的矛盾。若依「重譯共球」理念，清宮《職貢圖》中真正需要多語重譯的成員，應是愛烏罕、巴達克山等極西朝貢屬邦，以及西洋各國；至於帝國領土內的成員，無論被征服的厄魯特蒙古，或遷入的土爾扈特蒙古，在身分改列藩部之後，縱然實際治理中仍需滿、蒙、回等語文翻譯，其性質已與上述外部「重譯」不同。因此，從藩部成員的角度看，彩繪本卷一中的伊犁群組，以及哈密、肅州回民等人群與地域，作為帝國境內成員，卻被納入以朝貢外藩為核心的卷一，實屬例外與矛盾，其再現方式有必要進一步考察。

（三）版本的演進、增補與西域的擴張

1. 從《職方會覽》到《職貢圖》的名稱確立

《職貢圖》的版本演進與名稱變遷，與西域戰事密切相關。據《活計檔》記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初九日，清宮根據太監胡世傑呈上的《職方會覽》冊頁二套（共十二冊），傳旨丁觀鵬、金廷標合畫手卷四卷。³¹學界推測，此四卷即為後來《石渠寶笈續編》所著錄，由丁觀鵬、金廷標、姚文瀚、程梁四人分卷繪製的第一套《職貢圖》。只是當時是否已題名「職貢圖」，或仍稱《職方會覽》，已不可確知。³²

隨後《活計檔》顯示，戰爭未竟之時，西域成員已被加速納入：乾隆二十二年九月蒐集哈薩克人圖像；乾隆二十四年四月，伊犁等處夷人圖像十二頁

國俱三年一貢。向時依期入貢，各國使臣不能相值。」清高宗敕撰，〔清〕于敏中編，《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冊 10，《御製詩五集》，卷 51，頁 45a。另有〈新正素尚齋〉，內容同《實錄》所載，賜宴五國使臣。見《御製詩五集》，卷 51，頁 12a。

31 〈如意館〉，《活計檔》，乾隆二十二年七月初九日，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冊 22，頁 548。以下簡稱《總匯》。

32 中國國家博物館現藏金廷標《職貢圖》二卷，應就是《石渠寶笈續編》收錄的同一套之第二卷。參見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75，頁 10。

已裝裱完成，標誌伊犁群組圖像告成。³³此後，「職貢圖」之名逐漸確立。乾隆二十六年（1761）七月，乾隆皇帝為卷本第一卷卷端題詩，將「皇清職貢」寫入詩句；³⁴同年十月二十七日，又傳旨重換裱裝手卷四卷，³⁵這應是卷本最早明確以「職貢圖」命名的紀錄。故學界普遍認為乾隆二十六年是《職貢圖》正式告成的時間點。

隨後仍有若干增補與重製：乾隆二十七年初（1762），姚文瀚奉旨補畫第三卷未完三段；³⁶乾隆二十八年（1763）起又陸續增補愛烏罕、霍罕等成員；³⁷至乾隆四十年（1775）後，皇帝再命賈全、顧銓依乾清宮《職貢圖》尺寸各繪一分，乾隆四十四年（1779）交出二分手卷，每分四卷，³⁸使卷本《職貢圖》共計三分。

作為底本的《職方會覽》，地位則隨之下降。乾隆二十六年底，存軍機處的《職方會覽》二套十二冊因汙損重行裱裝；³⁹翌年正月交還軍機處的時間，恰與姚文瀚奉旨補畫《職貢圖》前後相接。此後，《職方會覽》在檔案中幾乎

³³ 〈如意館〉，《活計檔》，乾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收入《總匯》，冊 22，頁 558：「二十二日軍機處傳旨：著畫哈薩克人像貌。欽此。」〈匣裱作〉，《活計檔》，乾隆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收入《總匯》，冊 24，頁 441：「（乾隆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筆帖式雙全持來方略館知會一件，內開軍機處奉旨派添辦伊犁等處夷人圖像十二頁，著派員領裱等因，啓果親王，准行。遵此。」另見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75，頁 15。

³⁴ 御製題詩首段：「累洽重熙四海春，皇清職貢萬方均。書文車軌誰能外，方趾圓顙莫不親。」莊吉發，《謝遂滿漢文《職貢圖》說校注》，頁 39。

³⁵ 〈如意館〉，《活計檔》，乾隆二十六年十月初二日，收入《總匯》，冊 26，頁 667。包括換絲包首、大玉鶯子、袱子。

³⁶ 〈如意館〉，《活計檔》，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初十日，收入《總匯》，冊 27，頁 166。

³⁷ 《四庫全書總目》，卷 71，史部地理類四，〈皇清職貢圖〉，頁 633。

³⁸ 〈如意館〉，《活計檔》，乾隆四十年十月十二日，收入《總匯》，冊 38，頁 60，原文「賈顧全」，應指「賈全、顧銓」二人；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十八日，收入《總匯》，冊 42，頁 701：「四月二十六日「董五經交《職貢圖》手卷二分，每分四卷。傳旨：交如意館裱手卷包首，照現有《職貢圖》絳絲包首花紋一樣，交蘇州辦造，送來做袱、鶯樣，一併發往南邊，依前做法照樣做來。欽此。」賴毓芝分析顧銓於乾隆四十二年七月因母患病告回家，很可能即由謝遂接手，最後成為由謝遂署名的臺北故宮卷本《職貢圖》。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75，頁 14-15。

³⁹ 〈如意館〉，《活計檔》，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收入《總匯》，冊 26，頁 544-545。

不再出現，而自乾隆二十八年起，《活計檔》則固定以「職貢圖」為名記錄。⁴⁰名稱的轉換與定調，正標誌著西域成員納入後，清廷已將此圖明確置於「職貢」體系之中。

隨著《職貢圖》的定型，其版本也在官方典籍中擴散與增補：乾隆四十二年（1777），以《皇清職貢圖》之名收入《四庫全書薈要》，次年再編入《文淵閣四庫全書》。乾隆年間的武英殿刊本，既有未含乾隆二十六年後增補成員的八卷本，也有包含增補的九卷本。嘉慶十年（1805），又繪製含越南成員的四卷本；同年武英殿重刊本，亦補入乾隆五十五年增繪的巴勒布大頭人與越南等成員。⁴¹

2. 《萬國來朝圖》的同步繪製與成員共通

《職貢圖》與《萬國來朝圖》在成員構成與宣傳目的上高度同步。平定回部後，乾隆二十五年（1760）正月初十日，回部俘酋數人被押解至京師獻俘；⁴²就在獻俘前夕（正月初九日），乾隆皇帝即傳旨徐揚、張廷彥、金廷標繪製《萬國來朝》大畫，⁴³顯示其意在即時運用圖畫的虛構場景，向萬國使臣宣揚征服回部的軍事成就。次年七月，乾隆皇帝為《職貢圖》御題詩作，標誌卷本《職貢圖》正式成立；同年七月十四日，又傳旨姚文瀚、張彥廷等再度起稿《萬國來朝圖》。⁴⁴此圖持續繪製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⁴⁵目前可見《萬國來朝圖》

⁴⁰ 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75，頁 11。

⁴¹ 參見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75，頁 16。

⁴²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604，乾隆二十五年正月丙辰（十日），頁 785；正月丁巳（十一日），頁 785。

⁴³ 〈如意館〉，《活計檔》，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初十日，「此大畫原為養心殿東暖閣明窗繪製」，收入《總匯》，冊 25，頁 481。

⁴⁴ 〈如意館〉，《活計檔》，乾隆二十六年七月十六日，收入《總匯》，冊 26，頁 713。此軸亦題寫該御題詩作，其中即有「皇清職貢萬方均」句。

⁴⁵ 〈如意館〉，《活計檔》，乾隆四十五年六月十八日，收入《總匯》，冊 44，頁 35。內載是年五月初九日將萬國來朝圖一張呈覽，奉旨交如意館托裱。

共四軸及冊頁一開，⁴⁶其畫面中的外國、西域成員與卷本《職貢圖》第一卷清單幾乎完全相同。⁴⁷

由此可見，《職貢圖》與《萬國來朝圖》共享一套核心職貢成員清單，兩者共同承擔宣揚帝國武功與整合西域知識的雙重宣傳功能。

3. 命名原則的確立與「職貢」的包容性

與《職貢圖》相關的圖像版本還包括：乾隆二十七年徐揚進呈的《聖謨廣運萬國來朝圖》手卷稿，以卷軸形式呈現「萬國來朝」的主題；⁴⁸乾隆二十九年（1764）又見「交徐揚畫《西域獻俘圖》手卷一卷」之記載，⁴⁹學界多推測此卷極可能即是前者改名而成。⁵⁰這類以「萬國來朝」為名的畫卷，外國與西域成員清單雖與《職貢圖》卷一高度相似，卻同時納入西藏、關東等地區成員。若依「萬國來朝」字面理解，將已屬邊疆、藩部體系的西藏、關東諸族一併視作「萬國」，名稱與實際範圍便出現落差。尤其卷本《職貢圖》第二至四卷均為各省邊民（而非外國），若要涵蓋如此廣泛的區域與身分，顯然不宜再以「萬國來朝」為名，而須改用能包容外國、藩部與邊民的更大框架。「王會」或「職貢」正提供了這樣的命名資源，使清廷得以在同一圖像體系下，同時呈現朝貢外藩與帝國疆域內多層次的藩部與邊民。

⁴⁶ 《萬國來朝圖軸》四幅立軸及一冊頁本均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萬國來朝圖軸》，故 6271、故 6273、故 6274、故 6504。賴毓芝，〈構築理想帝國：《職貢圖》與《萬國來朝圖》的製作〉，《紫禁城》，2014 年第 10 期，頁 56-69。關於《萬國來朝圖》的製作與流傳，可參見乾隆三十一年、四十三年的《活計檔》記載；另於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完成的《臚歡薈景圖冊》中，亦有《萬國來朝圖》一開。

⁴⁷ 賴毓芝比較卷本《職貢圖》第一卷、《萬國來朝圖》，發現二圖成員大致相同，皆以呈現帝都萬國來朝盛況為旨趣，均在於彰顯清朝天下共主的政治形象。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75，頁 19-24。

⁴⁸ 〈如意館〉，《活計檔》，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初十日，收入《總匯》，冊 27，頁 167；乾隆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收入《總匯》，冊 28，頁 801。

⁴⁹ 〈如意館〉，《活計檔》，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五日，收入《總匯》，冊 28，頁 826。

⁵⁰ 〈徐揚畫平定西域獻俘禮圖一卷〉，該卷題簽為「徐揚畫平定西域獻俘禮圖」，見劉如仲，〈平定西域獻俘禮圖研究〉，收入易蘇昊、樊則春主編，《五臺山人藏：徐揚畫平定西域獻俘禮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無頁碼。該畫卷亦收入《石渠寶笈續編》，題名則將「西域」改作「回部」。〔清〕王杰等奉敕編，《欽定石渠寶笈續編》，冊 2，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海南：海南出版社，2000），冊 441，乾清宮藏十四，頁 343。

總之，《職貢圖》的定型，以及與之同步繪製的《萬國來朝圖》、《平定西域獻俘禮圖》等作品，都是西域戰爭所催生的帝國宣傳與知識整合工程。《職貢圖》的命名、增繪與卷數變化，無不與戰爭進程及西域成員的納入相互勾連。正是在這場戰爭的推動下，清廷的圖像製作才從「會覽」（記錄邊民）、「來朝」（記錄外國）的既有概念中突破，最終定名為更具包容性的「職貢圖」體系，為將西域納入帝國圖像秩序提供了表述上的整合。然而，這種正當化框架仍無法掩蓋核心成員在身分定位與圖說稱謂上的分類張力，以下即由相關稱謂的規律與例外加以考察。

三、西域群體的身分矛盾與圖像再現

（一）西域成員的稱謂通則與例外分析

1. 圖說稱謂的常規與身分定性

《職貢圖》第一卷收錄的西域成員，與傳統職貢對象相比，呈現何種異同？所謂「西域成員」，特指彩繪本第一卷中，緊接西藏群組之後，包括伊犁群組（厄魯特蒙古）、回部各城與哈薩克等內陸亞洲群體（編號 45-84）。以下以莊吉發《謝遂滿漢文《職貢圖》圖說校注》所整理之圖次序號為依據，⁵¹著重分析第一卷圖說在「民人」、「夷人」、「番民」、「回人」、「回目」等稱謂的使用規律與例外情形，藉此觀察清朝在邊疆統治與歷史書寫中，如何透過稱謂的運用建構不同族群的政治身分與統屬關係。

在第一卷所收錄的朝貢外國中（編號 1-37），⁵²朝鮮一組分別題為「朝鮮國夷官」與「朝鮮國民人」，亦即其官員仍稱「夷官」，一般成員則稱「民人」（滿文對應 *irgen*）；⁵³其餘外國成員則多成對使用「夷官」與「夷人」。由此

⁵¹ 莊吉發，《謝遂滿漢文《職貢圖》圖說校注》，頁 2-10。

⁵² 莊吉發，《謝遂滿漢文《職貢圖》圖說校注》，頁 40-113。

⁵³ 莊吉發，《謝遂滿漢文《職貢圖》圖說校注》，頁 40-43。此處所稱「慣常」，係指「夷官／夷人」為《職貢圖》卷一朝貢外國圖說中反覆出現的主要稱謂模式，並非逕指其沿襲前代職貢文獻的書寫慣例。

可見，「夷官／夷人」構成卷一朝貢外國圖說的慣常稱謂，而朝鮮「夷官／民人」的組合則是其中的例外。相應的滿文圖說僅作 hafan（官）、niyalma（人），並未逐字對譯漢文的「夷」字，顯示漢、滿文圖說在族群標記上採取不完全對應的表述方式。

緊接著外國群體的，是清朝邊境及西藏周邊的群組的西藏群組（編號 38-44），如衛、藏、阿里、喀木諸番民等，漢文圖說多稱「番民」或「番人」，滿文則以 fandzi（番子）搭配 irgen、niyalma 等詞表述。與前述漢文「夷官／夷人」中的「夷」字多未見滿文對譯不同，「番」在滿文圖說中具有相對固定的對應稱謂，顯示二者在漢滿文本中的分類與轉譯方式並不相同。⁵⁴一些未必直接入京遣使者，如布魯克巴、穆安巴等，因經由西藏赴藏請安、貿易而「附於西藏」，間接成為廣義職貢成員。⁵⁵

然而，在這些較具常規性的稱謂之後，緊接著西藏群組出現的，即為本節討論的核心——自編號 45 開始的「伊犁群組」。其主要成員是清朝征服準噶爾後納入統治的厄魯特人。相較於前述朝貢外國與西藏群組，這些成員的圖說稱謂尤其涉及戰爭後政治身分與隸屬關係的界定，並由此呈現清廷如何將新征服人群納入《職貢圖》的成員秩序。

2. 厄魯特身分的隱晦與稱謂的迂迴

伊犁群組（編號 45-48）的構成包括四組成員（附圖 1）。⁵⁶前三組「伊犁等處台吉」、「伊犁等處宰桑」、「伊犁等處民人」，均以地域搭配職銜或一般身分命名；第四組「伊犁、塔爾奇、查汗烏蘇等處回人」則明確標示其族群

⁵⁴ 莊吉發，《謝遂滿漢文《職貢圖》圖說校注》，頁 114-127。前述朝貢外國圖說中的漢文「夷」字，滿文通常不另作對譯，而僅保留 hafan（官）、niyalma（人）等身分詞；西藏群組中的「番」則多以 fandzi 對應，具有較明確的詞彙對應及人群指向。「夷」的滿漢文表達和「夷」、「番」用法的差異，究竟出於翻譯習慣、滿語稱謂方式，又是否進一步反映漢滿文分類觀念的不同，尚須結合其他滿漢合璧文獻考察。

⁵⁵ 類似西藏群組因附屬關係而載入《職貢圖》卷一的，尚有安南國獬獬。該族群在安南境內，與雲南接壤，「雍正八年，以邊地四十里隸安南，俾就近管領約束」。莊吉發，《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頁 52-53。

⁵⁶ 莊吉發，《謝遂滿漢文《職貢圖》圖說校注》，頁 128-135。

稱謂。四組篇名所採取的不同命名方式，已呈現出值得注意的不對稱，回人身分直接見於篇目，前三組成員的族屬卻未在漢文篇名中明言。其中，台吉與宰桑是蒙古——厄魯特政治社會中的身分與職銜，「民人」則是相對於官員或上層人物而言的一般人民稱謂。

「伊犁」是清朝征服準噶爾汗國後建立的統治中樞。清廷宣稱「平定伊犁」即象徵準噶爾汗國覆亡，並在當地逐步建構九城系統，作為統治新疆的指揮中心：惠遠、惠寧兩城駐滿洲八旗官兵，另有數城駐綠營軍；同時安置自阿克蘇等南疆城市遷來、從事回屯的塔蘭奇穆斯林（回人）。⁵⁷塔爾奇、查汗烏蘇等地亦築城，查汗烏蘇即後來瞻德城，正是「伊犁、塔爾奇、查汗烏蘇等處回人」被納入此一群組的現實背景。⁵⁸

然而，前三組所指涉的主要人群，實際上正是準噶爾汗國的主體——厄魯特蒙古，這只能由圖說正文才能辨識：「伊犁即古屈里地也，舊為厄魯特部落，所屬有二十一處，乾隆二十年，我師平定，遂隸版圖。其人專事遊牧……其頭目謂之台吉。」⁵⁹在這段描述中，「古屈里地」似乎名不見經傳，⁶⁰只見「厄魯特部落」、「二十一處」，獨不見「準噶爾」之名。對於曾雄據內亞的汗國而言，這樣的輕描淡寫顯然與其歷史分量殊不相稱。

更關鍵的地方，在於對稱謂的迂迴處理。查對「伊犁等處民人」的滿文篇目 *ili i jergi ba i ület* 可知，此處漢文以不具族屬指向的「民人」，對應滿文的「厄魯特」（*ület*），並非單純將同一篇名逐字轉譯，而是隱去了厄魯特的族稱。相較於第四組的漢文「回人」與滿文 *hoise*（回子）均直接標示族屬，這

⁵⁷ 清朝在伊犁地區的軍事部署概況，參見米華健著，賈建飛譯，《嘉峪關外：1759-1864 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頁 104-105。綠營軍所在城市為：拱宸、瞻德、塔爾奇、廣仁、綏定，以及寧遠城。

⁵⁸ 〔清〕松筠等奉敕撰，《欽定新疆識略》，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冊 732，卷 4，頁 13b-16a。

⁵⁹ 莊吉發，《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頁 129。

⁶⁰ 乾隆二十一年（1756）奉敕纂的《西域圖志》也比勘作古屈里地，並提到可見於《漢書》。大部分文獻則把伊犁對應於漢代的烏孫。鍾興麒等校注，《西域圖志校注》（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卷 4，列表一，頁 130-131。

種不對稱的命名方式，使厄魯特僅能在滿文篇目裡看見，漢文篇目所示的由地域與身分界定的「伊犁等處民人」，則呈現迂迴且被弱化其族群及政治主體性的表述效果。

除了篇目命名，伊犁群組之所以特殊，也體現在同一征服背景下，不同人群所獲得的敘事方式亦不相同。圖說對第四組「伊犁塔爾奇查汗烏蘇等處回人」的描述是：「乾隆二十年平定伊犁，其回人阿迪斯伯克、烏蘇卜等輸誠向化，赴熱河朝覲，賜資遣歸。」⁶¹此處同樣以「平定伊犁」作為清廷與當地人群建立新關係的起點，阿迪斯伯克等人的輸誠與朝覲，則被敘述為平定之後的直接結果。前三組厄魯特人也被置於相同的戰後書寫脈絡中，圖說以「我師平定，遂隸版圖」概括其政治身分的轉變。二者的差異因而不在于一方與征服無關、僅因朝覲而入圖，而在于厄魯特被表述為平定後納入版圖的人群，回人則以輸誠赴覲的行動獲得呈現。至於戰爭後伊犁厄魯特的朝覲、輸誠，則以準噶爾汗達瓦齊被俘、解送京師成為獻俘禮的對象，隨後獲授親王爵載入其他官修史書。⁶²

總體而言，以「伊犁」作為共同的區域題名，四組成員均被置於「平定伊犁」所開啓的戰後秩序之中，伊犁群組同時納入厄魯特人（準噶爾主體）與回人（塔蘭奇穆斯林），並區分為台吉、宰桑、民人、回人四組成員，成為全書以同一區域加上族群為題名，而細分成員最多的群組，顯示伊犁區域在整體編排中占有突出的地位。⁶³然而，回人之名公開而明確，厄魯特之名則在漢文篇目中受到遮蔽。這種共同征服背景下的差別表述，不僅反映清朝對西域不同人群的分類與表述方式，也呈現其如何透過圖像建構征服後的西域秩序。

⁶¹ 《清實錄》記載了清朝對當地回人授總管、侍衛等職，「命授管理伯得爾格鄂拓克回人伯克阿底斯為三品總管，烏蘇卜、阿卜都喇伊木為二等侍衛，吐魯番回人伊必里野木為三等侍衛。」參見《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498，乾隆二十年十月甲辰（四日），頁 262。

⁶² 乾隆二十年十月，「俘達瓦齊至，告祭太廟社稷」；達瓦齊卒於乾隆二十四年。參見〔清〕祁韻士等奉敕撰，包文漢、奇·朝克圖整理，《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第一輯）》（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8），卷 94，〈綽羅斯和碩親王達瓦齊列傳〉，頁 630-631。

⁶³ 齊光指出，這裡的伊犁台吉是強調他們的領主（蒙文 noyan）身分，而非清朝授予的爵位，當時歸附的準噶爾人尚未編入八旗，仍保有原來的社會體制。齊光，〈解析《皇清職貢圖》繪卷及其滿漢文圖說〉，《清史研究》，2014 年第 4 期，頁 33。

3. 回部相關成員的稱謂與身分區分

緊接伊犁群組之後的，是哈薩克頭目、民人（編號 49、50）和布魯特頭目、民人（編號 51、52）。圖說首先記載：哈薩克「在準噶爾西北，即漢大宛也，自古未通中國」；布魯特「在準噶爾西南，亦回種也」。⁶⁴二者均以準噶爾作為方位座標，圖說正文亦顯示《職貢圖》是在征服準噶爾及其周邊的空間框架中，理解並安排這些新近進入清廷視野的中亞部落。

布魯特圖說中的「回種」，滿文對應作 *hoise i duwali*，其中 *hoise* 意即回子，而 *duwali* 意為同類，故「回種」即指回子的同類，主要是在族類知識上將布魯特與「回」相聯繫。哈薩克與布魯特又均區分頭目（滿文對應 *data*）與民人（滿文對應 *irgen*），表示部落內部的身分層次，一如朝鮮群組，以「民人」類比於一般百姓。

接著出現的是天山以南的回部，以及與之相關的中亞城邦部落。烏什、庫車、阿克蘇等城的回目、回人（編號 53、54），圖說明確指出：「西域回部也」（*wargi jecen i hoise i aiman*）。這些城市的回目（*hoise data*，回子頭目）和回人（*hoise*，回子）在乾隆二十四年戰爭結束後，正式被清朝統治。

由於他們既非清朝的民人（不使用 *irgen*），也非純粹的外國人（不使用 *niyalma*），因此圖說選用「回子」（*hoise*）作為其族屬稱謂。⁶⁵至於中亞屬部（編號 55-58）：拔達山回目、回民，⁶⁶及安集延回目、回民，⁶⁷圖說強調他們與喀什哈爾接壤或有貿易往來，拔達山是「西域回部之稍大者」，可知回部一詞在當時沒有限定是境內。這顯示儘管這些「回民」是不受清朝直接管轄的外國，但因滿文對應作 *hoise i irgen*，意即回子之民人，「民 / *irgen*」並非毫無分類意義。這種稱謂的使用，旨在強調在《職貢圖》卷一他們與清朝回部在族群或地理上的關聯性，而非單純的朝貢國身分。

⁶⁴ 莊吉發，《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頁 136-139。圖說所示哈薩克、布魯特向清朝歸誠朝覲的時間點，均於征服準噶爾之後，前者在乾隆二十二年，後者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

⁶⁵ 莊吉發，《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頁 140-141。

⁶⁶ 莊吉發，《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頁 142-143。

⁶⁷ 莊吉發，《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頁 144-145。

《職貢圖》卷一中，滿文「回子 / hoise」與前述「番子 / fandz」的使用方式頗為相近：二者本身均可作為族類名稱，指稱該群體的成員，也可進一步搭配「民 / irgen」，與頭目相對，用以表示其中的一般人眾。相較之下，琉球、安南、大西洋等外國群體，則較常以「人 / niyalma」作為人物稱謂。由此可見，irgen 與 niyalma 在圖說中確實形成了兩種不同的人群表述慣例，惟這一差異尚不能直接等同於臣民與外國人的政治界線。哈薩克、布魯特以及拔達山、安集延與清朝的政治關係並不相同，卻都可以使用 irgen；其中拔達山、安集延並不受清朝直接管轄，其一般成員仍稱 hoise i irgen。因此，相較於「某國人 / 某地人 (niyalma)」則較常用於以外國政體或地域為中心的人群表述，「回子 / 番子 + 民 (irgen)」首先反映的是以族類為中心的分類方式，雖不足以單憑稱謂判定其是否已成為清朝直接統治下的臣民，但尚可顯示相關群體被納入清朝關於西域、回部及「番子」部族的族類知識框架。

總結《職貢圖》中西域成員的排列，可以看出其收錄具有明顯的即時性，大致依朝覲事件先後排序：哈薩克（乾隆二十二年）在前，其後依次為布魯特與烏什、庫車、阿克蘇等回部（乾隆二十三年），以及巴達克山、安集延（乾隆二十四年）。這種時間上的緊密對應，更凸顯《職貢圖》作為西域戰後「即時性歷史書寫」的性質。

（二）內附回民的例外收錄與政治考量

1. 內附回民的身分界定與地理原則的例外

卷本第一卷末尾接著兩組位於甘肅邊疆的內附回民：安西廳哈密回民（編號 59）與肅州金塔寺魯古慶等族回民（編號 60），⁶⁸其滿文稱謂皆作 hoise irgen（回子民人）。相較於前文安集延等藩屬回民的 hoise i irgen（回子之民人），這裡省略介詞 i 的用法，由於不同版本的滿文題名又存在翻譯差異，⁶⁹此稱謂

⁶⁸ 莊吉發，〈《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頁 146-147。

⁶⁹ 曲強，〈《皇清職貢圖》所見清朝對回疆地區的認知與書寫〉，頁 86-89。曲強比較法藏本與臺北故宮本的滿文題名，指出「安西廳哈密」與「肅州金塔寺魯古慶」兩圖的滿文表述存在版本差異，並認為「安西廳哈密」題名可能因譯者誤解安西與哈密的行政關係而產生誤譯。

現象或無法據以判定其內附身分。但是，「安西廳哈密回民」圖說重點指出哈密回長自清朝定鼎前即來朝貢、設置駐防而成爲西路重鎮，飲食、衣服與內地回民相同；又附載雍正年間安插投誠回民於甘肅瓜州五堡，歲貢哈密瓜等物，特別強調「服飾與哈密同」。因此，哈密回民不同於一般境外部落的地位，主要建立在受封、編旗、札薩克管轄及軍事駐防等制度關係之上；飲食、服飾與內地或哈密回民相同，則是在文化表述上連結哈密、瓜州與內地回民。

肅州回民則原爲土魯番內附之回人，於康熙年間內附，並非因朝覲而入圖，其居住地在甘肅境內酒泉一帶，飲食、衣服同樣與內地回民無異。依《職貢圖》按省分安置邊民的原則，肅州回民理應歸入卷本第三卷（刊本、寫本爲卷五）的甘肅省境邊民，卻被置於卷本第一卷之末，成爲極爲醒目的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安西廳哈密」與「肅州金塔寺魯古慶」兩圖在《廣輿勝覽》中原列於陝甘部分，至《職貢圖》各本才被移至西域回人序列的末端。《廣輿勝覽》是《職貢圖》形成過程中的前期底本之一，兩圖的位置並非單純「違反」地理原則，而是地域與族類兩種分類方式重新權衡的結果。⁷⁰

這種移置客觀上使第一卷末段形成一個相互連接的回人序列：包括天山南路受清朝直接統治的回部、與回部相鄰或往來的中亞回人，以及由哈密、吐魯番內附或遷入甘肅的回民。現有證據尚不足以證明編纂者刻意藉此建構完整的「回人群體」，或意在鞏固清朝對回部的統治敘事；但至少可以說明，在《職貢圖》的分類與編排中，族類稱謂、來源地及與西域的歷史關聯，有時可以超越現居省域，成爲安排人物篇目的另一項依據。

2. 增補成員的朝覲原則與擴張意圖

乾隆二十六年《職貢圖》初告成後，自二十八年起又有四次重要補繪。臺北故宮傳謝遂本可見，這些新成員都加在第一卷，並插入既有篇目之間。學界

⁷⁰ 據楊揚所見《廣輿勝覽》，「安西廳哈密」與「肅州金塔寺魯古慶」兩圖原列陝甘部分，位於「肅州番目溫布所轄黑番」之前。曲強據此進一步推測兩圖後來移入法藏本冊頁第二冊末尾的可能原因。參見楊揚，〈《廣輿勝覽》與《皇清職貢圖》的關係〉，《美術》，期 666（2023 年 6 月），頁 113；曲強，〈《皇清職貢圖》所見清朝對回疆地區的認知與書寫〉，頁 80-83。

多認為，補入成員的共同條件是曾朝覲皇帝，且皆屬內陸亞洲範圍，顯示卷一內亞群體持續擴張。⁷¹

第一次補繪為中亞藩屬：愛烏罕回人、霍罕回人、啓齊玉蘇部、烏爾根齊部等五組（編號 61-65），均稱「回人」（hoise），接在肅州回民（編號 60）之後。⁷²圖說以拔達克山為座標界定愛烏罕、霍罕的極西位置，啓齊玉蘇、烏爾根齊則為西哈薩克別部，藉此補齊與西域征服緊密相關的中亞屬邦。

第二次補繪為衛拉特藩部：土爾扈特臺吉、宰桑、民人三組（編號 66-68），架構仿伊犁群組。⁷³土爾扈特自俄羅斯東遷伊犁後，已編為藩部，⁷⁴當時將之視為平定準噶爾事功的延續。⁷⁵圖說另附御製識語，強調自此衛拉特四部悉為臣僕，將原本應歸理藩院體系處理的「藩部來歸」，納入職貢圖像清單，顯露其收錄標準的政治性與彈性。

第三次補繪為雲南邊外：整欠頭目、景海頭目二組（編號 69-70），為九龍江邊外內附土司。乾隆四十年因朝貢被列入第一卷，而非歸入雲南省邊民卷（卷本卷四、寫本刊本卷七）。⁷⁶圖說一方面肯定其朝貢身分，一方面又以服飾、物產將之連接到雲南、四川境內之「擺夷」，⁷⁷這種表述使整欠、景海同時呈現為邊外來朝者，以及可由既有西南族類知識加以理解的人群中。其後在

⁷¹ 這個現象先前已受到莊吉發、畏冬、賴毓芝等人的關注，賴毓芝認為應是因為他們全都朝覲過皇帝。參見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75，頁 16-23。

⁷² 莊吉發，《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頁 150-161。

⁷³ 莊吉發，《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頁 162-165。補繪於哈薩克別部（烏爾根齊部哈雅部所屬回人）之後，惟只有圖說一篇。

⁷⁴ 東遷後的土爾扈特部，清朝設置盟旗，任命正、副盟長，編扎薩克、旗分、佐領，鑄給印信。馬大正、成崇德主編，《衛拉特蒙古史綱》（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頁 303-312。

⁷⁵ 清高宗敕撰，《御製詩文十全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3），卷 11，再定準噶爾第三之六，文九首，頁 129-134。

⁷⁶ 莊吉發，《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頁 166-171。根據寫於圖說之前乾隆皇帝的〈題識〉：「今年冬，其頭目象象牙、犀角來獻，令預朝正班末，因繪其服飾附於圖後。乾隆乙未嘉平月御識」，乾隆乙未即乾隆四十年。

⁷⁷ 莊吉發，《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四川）會川營轄通安等處擺夷，頁 430-431；會川營轄迷易普隆等處擺夷，頁 434-435；（雲南）曲靖等府樊夷，頁 488-489。

嘉慶重修《大清一統志》中，整欠等地位又被轉入「外國」，可見此類邊外群體的身分在不同文獻中仍具流動性。⁷⁸

第四次補繪為南亞廓爾喀：巴勒布大頭人並從人一組（編號 44），乾隆五十四年（1789）廓爾喀（巴勒布）押送貢物入京而補入。⁷⁹因其地鄰西藏，故附列於西藏群組。

總結四次增補，可見卷一後段密集新增的內亞成員皆以「朝覲」為主要收錄依據，卷一本身遂成為一部隨邊疆政治局勢滾動修正的「即時」職貢清單。

綜上所述，伴隨「伊犁群組」而來的一系列新成員——包括伊犁厄魯特、天山南北回部諸城、哈薩克及中亞藩屬等，大致涵蓋原先受準噶爾政權支配、影響，或與其相鄰往來的人群與區域。與其說《職貢圖》在圖像層面同步接收了「準噶爾汗國的遺產」，⁸⁰不如說它藉由這些新增篇目，將清朝平定準噶爾後重新建立的政治關係與地理訊息編入卷一。這種編排在卷一中表現得尤為集中：伊犁群組緊接西藏群組，其內又以厄魯特諸篇居前、回人篇目接續在後，自塔爾奇、查汗烏蘇等處回人（編號 48）至烏爾根齊部哈雅布所屬回人（編號 65），除哈薩克頭目、民人二組外，多達十八組的篇目均以回人、回民、回目或與「回種」相關的稱謂呈現，形成一串連續而密集的回人相關序列。這一密集序列也與乾隆朝官修文獻將甘肅回民與西域各地回人置於共同祖源的認知相呼應。⁸¹再參照乾隆皇帝於彩繪本卷一引首題寫「蘿圖式廓」（疆域規模擴張），可見歷次增繪的西域成員並非單純的增補，而是透過成員的持續累積與排列，將清朝平定西域後的帝國擴張具體轉化為可見的圖像效果。

⁷⁸ [清]穆彰阿等奉敕撰，《嘉慶重修一統志》，收入《四部叢刊續編》（上海：商務印書館景印，1934），冊 200，卷 556，緬甸、暎咭喇、整欠、葫蘆國、馬辰，頁 1。

⁷⁹ 莊吉發，〈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頁 126-127。

⁸⁰ 馬子木，〈乾隆朝初通巴達克山考——兼論準噶爾遺產與清朝中亞外交之初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88 本第 2 分，頁 347-396。

⁸¹ 這種知識連結包括有著共同的祖國，「其祖國稱默德那，其種類則居天山之南北。後準噶爾據有山北，乃悉避處於山南。今自哈密、吐魯蕃以外，西暨和闐、葉爾羌，皆所居也。」《四庫全書總目》，卷 49，史部紀事本末類，〈欽定蘭州紀略〉，頁 442。

然而，《職貢圖》對帝國新成員的圖像建構及空間次序重組，尚不足以說明清廷如何在不同官修知識體系中安置這些新近進入其政治視野的人群與地域。以下將轉而比較《職貢圖》、增修《大清一統志》及《御製增訂清文鑑》，考察地理總志與官修辭書如何在條目、類目與詞彙中安置這些西域朝貢諸國與藩部群族，並分析不同文獻體裁對其政治關係、地理位置與族屬身分的表述，究竟彼此呼應，抑或存在差異。

四、乾隆朝《職貢圖》與增修《大清一統志》的西域朝貢諸國

（一）圖像計畫與地理總志的並行：從《職貢圖》到御敕增修《大清一統志》

《職貢圖》、《萬國來朝圖》、《平定西域獻俘禮圖》等圖像計畫，幾乎與《大清一統志》的增修同步推進。前文已述，乾隆八年（1743）成書的《大清一統志》已將「西洋」作為一整體條目，乾隆朝《職貢圖》則從中挑選成員，予以視覺化排列與放大；相對地，《一統志》在處理西域時，則是直接新增並擴充清單，將新拓疆土及其藩屬政權一一編入。

乾隆八年《大清一統志》雖已纂成，至乾隆十六年才全卷刊刻告竣。⁸²但僅過十餘年，乾隆二十九年（1764）即決意增修。御史曹學閔上奏請修時，軍機大臣以成書時間尚近、西域新疆局勢未穩、行政區劃可能再調整等理由，主張暫緩，並建議待《平定準噶爾方略》、《西域圖志》等告成後再作考慮。乾隆皇帝卻全盤否決，要求立即增修。其諭旨要點，與《職貢圖》新增的西域成員高度一致：一方面指出西域新疆拓地二萬餘里，新設安西府及哈密、巴里坤、烏魯木齊等道、府、州縣軍政機構，應附入甘肅；另一方面，又主張將伊犁、葉爾羌、和闐等處另纂於甘肅之後，並將哈薩克、布魯特、巴達克山、愛烏罕等部「照外藩屬國例」分條編入。⁸³

⁸² 傅恆，〈為奏擬應賞大清一統志官員名單事〉，乾隆十六年十月十四日，收入《內閣大庫檔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登錄號 019553-001。

⁸³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722，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戊申朔（一日），頁 1044-1046。增修《一統志》於乾隆四十九年（1784）告成。

由此可見，增修重點在於體例重編：一是將新設行政區納入甘肅體系，創設「西域新疆」這一政區範疇；二是將西北諸藩屬明確歸入「外藩屬國」清單，在國家地理總志中即時確立對西域新拓疆土及其屬邦的統治宣稱。

新版《大清一統志》中出現的「西域新疆統部」，正是這種體例調整的集中體現。「統部」本用以總稱京師以下各大區域，包括盛京、直隸、各省、新疆及蒙古藩部等；「西域新疆統部」之下，又分為「西域新疆」與「新疆藩屬」兩大群組，前者涵蓋自伊犁、庫爾喀喇烏蘇至葉爾羌、和闐等十四地，後者則列出十三個藩屬政權。⁸⁴嘉慶十六年（1811）再修《大清一統志》時，將「西域新疆統部」改稱「新疆統部」，成員大致不變。⁸⁵換言之，圖像層面的《職貢圖》與文字層面的《大清一統志》增修，是同一套西域新秩序的兩種表現形式：前者透過人物與空間的視覺編排，後者則以「統部」與條目清單的方式，將征服後的西域固定在（納入）帝國地理與知識體系之中。

（二）清單的對應與內外邊界：哈密、肅州回民的例外收錄

參照乾隆增修《大清一統志》的架構，可更清楚看出《職貢圖》圖次與卷一成員的概念。乾隆本《大清一統志》中，「西藏」之前為蒙古各部，包含「舊藩蒙古五十一旗」及「新藩蒙古」（牧廠、察哈爾、喀爾喀、青海、西套厄魯特）等，皆歸藩部體系，不列為職貢成員，因此在《職貢圖》中也付之闕如。⁸⁶

「西藏」以下，則依次為「西域新疆統部」與「朝貢各國」。若與卷本《職貢圖》對照，可見卷一成員實際正由這三大區塊組成：西藏、西域新疆與朝貢各國，只是《職貢圖》將朝貢諸國提前放在最前，調整了排序。至於原屬甘肅

⁸⁴ [清]和珅等奉敕撰，《欽定大清一統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74，目錄下，頁 42-43。卷 414 至 419，西域新疆；卷 420，新疆藩屬；「西藏」在〈新疆西域統部〉之前，卷次 413。

⁸⁵ [清]穆彰阿等奉敕撰，《嘉慶重修一統志》，收入《四部叢刊續編》，冊 99，目錄下，頁 30-37。此本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告成，重新調整諸藩部的序列，卷 516 至 531，新疆統部；卷 532 至 533，烏里雅蘇台統部；卷 534 至 549 蒙古統部，內含卷 547「西藏」；卷 550 至 560 為「朝貢各國」。

⁸⁶ [清]和珅等奉敕撰，《欽定大清一統志》，目錄下，卷 405 至 408，舊藩蒙古五十一旗；卷 409 至 412，新藩蒙古，頁 41-42。

一省行政區的「安西廳哈密回民」、「肅州金塔寺魯古慶等族回民」，則與已設將軍、大臣，強調「如同內地一省」的伊犁、葉爾羌、和闐，以及周邊中亞各部一併被納入卷一。

由此可見，卷一並非單純對應《大清一統志》所示朝貢關係或行政隸屬，自朝鮮、西洋等外國起，接續西藏群組，再向下銜接伊犁群組（厄魯特）、回城群組、哈密與肅州回民，以及西域外藩。其編排既保留傳統職貢圖譜所呈現的外國朝貢序列，又將已納入省級行政、藩部體系或西域新建統治架構的人群置於同一圖像序列。其中，哈密、肅州回民及伊犁、回城等群體，相較於朝鮮、西洋等外國，已不同程度納入清朝的行政、藩部或邊疆統治體系，因而可概括視為帝國的「內部成員」。這種內外成員的並置，正顯示乾隆朝《職貢圖》已不只是描繪朝貢國家的傳統圖譜，而逐漸轉變為呈現帝國政治秩序及其所涵攝人群的綜合性圖像。

（三）從「蒙古屬國」到西域朝貢名單：選擇性收錄與內部化傾向

乾隆八年版《大清一統志》中，哈密、土魯番、西藏與喀爾喀、青海、西套厄魯特，同列於「蒙古屬國」一組（卷三四九至三五二）。⁸⁷其中青海指的是青海厄魯特（和碩特部）。到了編纂《職貢圖》時，此一清單已被明顯「重寫」：哈密、土魯番、西藏被選入卷一本，而喀爾喀、青海、西套厄魯特則因已被納入新藩蒙古，由理藩院統轄，遂被排除在職貢成員之外。是否已被編入相對明確的蒙古藩部體系，可能成為影響其收錄與否的重要條件之一。

從卷本第一卷的順序來看，哈密回民與肅州回民位於甘肅境內，很可能就是乾隆二十六年卷一本成立時的卷末二組，亦與寫本、刻本《皇清職貢圖》第二卷卷末相對應。問題在於：他們並非清入關以來一貫被視為西域朝貢代表的人群。在乾隆八年版《大清一統志》的朝貢國清單裡，「土爾古特」與「葉爾

⁸⁷ 「蒙古屬國」此一用法，尚可見於〔清〕溫達等奉敕撰，《聖祖仁皇帝親征平定朔漠方略》，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355，卷 43，頁 557，上諭皇太子：「諸厄魯特皆已收集，蒙古屬國，靡不臣服，不遺一人。」

欽」（葉爾羌）才是明確的西域代表，其中並無哈密或肅州回民。⁸⁸也就是說，作為《職貢圖》成員，哈密與肅州回民是在平定準噶爾、回部之後，才以「內附回民」的身分被納入卷本第一卷；從早期以土爾古特、葉爾欽為代表的「外在西域朝貢國」，轉換為以哈密、肅州回民為代表的「內部回民」。雖然兩份名單之間未必構成前後相承的制度轉換，然而，相較於早期《大清一統志》較著重具有朝貢色彩的西域對象，卷本《職貢圖》確實更為突出哈密、肅州等已與清朝行政、軍事及邊疆治理體系建立密切關係的人群。

（四）從交涉對手到「亂臣」：準噶爾政權的政治降格與名稱重編

在用兵西域之前，清廷與厄魯特諸部及準噶爾政權之間，確有遣使、進獻、互市與議和等多重往來。清朝入關後，厄魯特部落屢有來貢，且與喀爾喀一同受宴。⁸⁹康熙皇帝亦明言「喀爾喀、厄魯特原皆納貢之國」，並承認其「習於戰鬥」而雄霸一方，⁹⁰反映清廷傾向以「納貢」語彙概括蒙古各部與皇帝之間的關係。既以喀爾喀、厄魯特為「納貢之國」，則從當時的官方表述邏輯而言，二者尚不排除成為職貢圖像對象的可能；其後隨著喀爾喀及部分厄魯特被納入藩部體系，這種可能性亦隨之消失。乾隆初年清、準關係相對和緩，雙方多次就貿易與赴藏熬茶等事協商，乾隆六至十七年間（1741-1752），準噶爾商隊與肅州、東科爾等地往來貿易達數次，朝貢與互市關係清楚可見。⁹¹

轉折點在乾隆十九年（1754）。為用兵準噶爾而下發的諭旨中，朝廷將達瓦齊定性為「篡竊亂臣」，否認其遣使來京的正當性，批評其「夷部亂臣，妄思視同與國」。⁹²此處的「與國」，結合清代有關俄羅斯及明朝的用例，較接

⁸⁸ [清]蔣廷錫等奉敕撰，《大清一統志》，卷 355，土爾古特，頁 34a-35a；葉爾欽，頁 36a-38b。

⁸⁹ 《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卷 45，順治六年八月丙午（十九日），頁 362。使臣名稱亦記於同頁：「上御中和殿，賜厄魯特部落貢使圖克齊文貝、喀爾喀部落貢使阿濟圖文貝等宴。」

⁹⁰ 《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卷 183，康熙三十六年五月癸卯（二十四日），頁 964。

⁹¹ 馬大正、成崇德主編，《衛拉特蒙古史綱》，頁 105。

⁹²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475，乾隆十九年十月甲戌（二十九日），頁 1143。最典型的清朝「與國」應是俄羅斯，事例如：「則俄羅斯乃我朝與國，從前定議，彼此不許容留逃人」，卷 548，乾隆二十二年十月辛酉（二日），頁 973。「與國」之意為相鄰的國家，事例尚見：「若我朝乃明與國」，出自敕纂《滿洲源流考》之上諭，《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039，

近相鄰並立、得以國與國形式交涉的政治實體，指地位相對平等的外國或鄰國。雖不能據此反向推定噶爾丹策零父子時代曾被正式承認為「與國」，這段話的政治修辭卻顯示，清廷透過否定達瓦齊政權的「與國」地位，將其表述為僭越篡奪的「亂臣」。

征服之後，《職貢圖》以群組方式重新編排邊疆人群，西藏與伊犁成為其中兩個相鄰而性質有別的單元，不同於《大清一統志》中的西藏條目，《職貢圖》已將其擴寫為帶有次級藩屬的「西藏群組」，在卷本第一卷中以「西藏」作為總題，統攝整個群組，⁹³並緊接諸朝貢國之後，成為卷一內部的第一個「藩部」單元。在刻本、四庫寫本等九卷本《職貢圖》中，西藏群組則被移至第二卷之首，其後接續伊犁群組，將西藏與「西域新疆」諸藩部並列於同卷，使其性質明顯有別於前一卷所列外國朝貢諸國。

到了乾嘉年間，《大清一統志》在〈西域新疆統部表〉中另立「準噶爾部」、「回部」兩欄，將相關地域與人群納入新建立的西域疆域架構，並在史籍考訂中把「瓦剌」視為「厄魯特」之舊音。⁹⁴與此相應，《職貢圖》卷一伊犁群組的圖說只提「四衛拉特蒙古」、「厄魯特」與平定伊犁戰爭，卻不再使用「準噶爾汗國」之名，只留下「準噶爾衛拉特／準噶爾四衛拉特」⁹⁵這類將「準噶爾」化約為地名的用法。⁹⁶

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壬子（十九日），頁 919；另參滿文本實錄對譯：musei gurun oci, ming gurun i adaki gurun，「與國」即鄰近之國（adaki gurun），《大清高宗純皇帝·滿文實錄》，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卷 1039，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壬子（十九日），故宮 013173。本文因而將「與國」理解為相鄰並存，並可作為國與國交涉對象的政治實體；至於是否另含友好、結盟或對等之意，仍須視具體語境而定。

⁹³ 莊吉發，《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頁 114-115。

⁹⁴ 〔清〕和坤等奉敕撰，《欽定大清一統志》，卷 413，頁 574。

⁹⁵ 例如，「土爾扈特舊為準噶爾四衛拉特之一」。莊吉發，《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頁 165。

⁹⁶ 將「準噶爾」化約為地名的用法尚可見於乾隆朝《平定準噶爾方略》，為接續康熙朝《親征平定朔漠方略》之作，總結清朝征服準噶爾汗國的官修史書，其滿文題名是：jun gar i ba（準噶爾地方）be necihiyeme toktobuha（平定）bodogon i bithe（方略），此處的準噶爾，正是準噶爾地方（jun gar i ba）。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辦公室滿文編輯部，《北京地區滿文圖書總目》（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頁 121-122。

五、「伊犁等地民人」即是「平定準噶爾厄魯特」

（一）職貢圖像的選擇性定型與滿文知識分類

乾隆朝《職貢圖》於乾隆二十六年初步告成，之後歷經四次增補，清廷一度認為此圖像體系可長可久，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云：「珥筆之臣，且翹佇新圖之更續矣。」⁹⁷然對照乾隆年間增纂《大清一統志》的職貢清單，塔什罕、博洛爾、布哈爾、痕都斯坦等內亞藩屬，⁹⁸至乾隆五十四年仍未收入《職貢圖》。雖然這未必表示《職貢圖》尚未完成，更可能反映兩種知識載體的收錄原則並不相同：《大清一統志》可以依據政治關係增列名目，《職貢圖》則受到朝覲是否實現，以及人物形貌、服飾等圖像資料能否取得的限制。至乾隆末年，此一體系在形式上仍保留續繪的可能，實際上卻已停止擴充，遂呈現開放形式下的實質定型。

時間稍晚，乾隆三十六年（1771）敕纂完成的《御製增訂清文鑑》，則以另一種知識形式整理西域征服後產生的人群與歷史詞彙。雖然僅憑編纂時間的先後，尚不足以認定《清文鑑》有意承接《職貢圖》，或兩者具有一貫的編纂宗旨；但二者可以視為清廷整理西域新知的不同載體。

《職貢圖》以人物圖像及當時的地域、群體稱謂，將伊犁群組、回城群組、厄魯特營等，難以完全按照傳統外國朝貢者理解的對象納入第一卷，保留一定的身分曖昧性；他們並未在嘉慶年間《職貢圖》改版（增補越南、殿本重刊）時被剔除，也說明這套採取職貢形式、卻包含新征服臣民的編排方式，似乎成為可以沿襲的「定本」。反觀《御製增訂清文鑑》以明確的征服者立場，將之編纂為「平定準噶爾厄魯特」、「平定回子」等歷史詞彙，可謂是同樣的西域征服經驗在不同知識載體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分類與定性。

⁹⁷ 《四庫全書總目》，卷 71，史部地理類四，〈皇清職貢圖〉，頁 634。

⁹⁸ 塔什罕（今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博洛爾（今巴基斯坦吉爾吉特河上游山區）、布哈爾（位在今烏茲別克斯坦布哈拉）、痕都斯坦（喀什米爾一帶）、巴勒提（今克什米爾巴提斯坦）。〔清〕和珅等奉敕撰，《欽定大清一統志》，目錄下，新疆藩屬，卷 420，頁 26b-27b。另外，乾隆年間敕纂《西域圖志》，還多列出了瑪爾噶朗（位於今吉爾吉斯斯坦馬吉蘭）、那木干（位於今吉爾吉斯斯坦納曼干），見《西域圖志校注》，卷 45、46，藩屬二、三，頁 573、582。

（二）被征服者的詞條化與與制度定位：納入旗分佐領類

清朝透過滿、漢文兩種載體書寫被征服者的歷史：一方面有滿、漢文圖說並陳的《職貢圖》卷本與冊頁本；另一方面則有以滿文解釋滿文詞條的《御製清文鑑》、《御製增訂清文鑑》。兩者相互對讀，可看出圖像與辭書在編寫征服史時功能各異。

康熙朝編纂的《御製清文鑑》中，已出現關於征服蒙古的歷史性詞條。⁹⁹ 乾隆朝用兵西域後，進一步對《清文鑑》增訂，既擴大收錄範圍，也創造出一批與征服有關的「新清語」。¹⁰⁰ 其體例按部門、類目收入詞彙，以滿文釋滿文。與本文主題最相關者，見於設官部（*hafan sindara šošohon*）下的旗分佐領類（*gūsa nirui hacin*）。¹⁰¹ 此類目原為說明八旗職官，卻同時將漠北、漠南蒙古諸盟旗，以及經征服、投誠後編入佐領、旗分的厄魯特一併收入，顯示辭書以清朝既有的八旗制度語彙，記錄其與旗分、佐領制度發生關係的方式。

這份旗分佐領詞條清單，可以視為清廷對歷代歸附、編旗及設佐領群體所作的制度性分類。條目包括察哈爾八旗、（漠南蒙古）四十九旗、歸化城土默特二旗、（喀爾喀蒙古）八十六旗、附隸八旗厄魯特、青海三十旗、阿蘭善山厄魯特一旗、西藏唐古特蒙古、土爾扈特一旗、新投誠準噶爾十六旗、平定準噶爾厄魯特、扎哈沁一旗、烏良海十一旗、哈密回子一旗、土爾番回子一旗、

⁹⁹ 包括（漠南蒙古）四十九旗（*dehi uyun gūsa*）、（喀爾喀蒙古）五十七旗（*susai nadan gūsa*）、附隸八旗厄魯特（*jakūn gūsa de kamcibuha ūlet*）、朝貢厄魯特（*alban jafame hengkilenjire ūlet*），這四個詞條的解釋內容，均收入〔清〕清聖祖敕纂，《御製清文鑑》（清康熙四十七年武英殿刊滿文本，柏林國家圖書館藏），卷 2，旗分佐領類，頁 6-7a。其中朝貢厄魯特的解釋內容，原指康熙年間準噶爾部車凌旺布、茂海、青海和碩特部扎什巴圖爾等率部來投之事，這是清代開國以來首次大規模厄魯特人歸降。《御製增訂清文鑑》將原有相關條目歸入「青海三十旗」之下，並增補雍正年間青海厄魯特與土爾扈特入旗之事。

¹⁰⁰ 乾隆年間新創滿文詞彙，所謂「新清語」，參見佟永功、關嘉祿，〈乾隆朝「欽定新清語」探析〉，《滿語研究》，1995 年第 2 期，頁 66-70。然而，《御製增訂清文鑑》並沒有編入乾隆三十六年土爾扈特舉部遷移回伊犁此一重大歷史事件，具體原因尚待進一步考察。

¹⁰¹ 不僅征服蒙古歷史被化約成滿文詞條，「滿洲」（*manju*）一詞也是歷史詞條，簡述收服各部女真的過程及部族清單。參見《御製清文鑑》，卷 5，人部，人類，第一，頁 1-2a；〔清〕傅恆等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32，卷 10，人部，人類，第一，頁 3b-4。

新投誠回子、平定回子、進貢回子等（詳見附表 2）。¹⁰²從滿文釋文可知，除太宗時期投降的察哈爾與漠南蒙古諸旗、歸化城土默特外，其餘多為康、雍、乾年間陸續編入旗分者，其中相當一部分與厄魯特、準噶爾及回部戰爭後的政治處置有關。

換言之，《御製增訂清文鑑》將兩次平定準噶爾與一次平定回部戰爭的主要對象，其中經投誠、遷置、編旗或設佐領者，以及由此形成的相關旗分名稱，納入旗分佐領類的辭書秩序，甚至成為若干歷史詞彙。

（三）詞條的政治定調：滿文辭書裡的征服敘事

「平定準噶爾厄魯特」一詞，實際上對應的正是《職貢圖》中「伊犁等地民人」與戰後所謂厄魯特營；而「平定回子」、「進貢回子」則可對應烏什、庫車、阿克蘇等回城與回人。兩者性質不同，卻都處理平定西域後產生的人群、地域與政治關係。¹⁰³

1. 貶抑與正當化敘事

「平定準噶爾厄魯特」（*necihiyeme toktobuha jun gar i ület*）的滿文詞條極為簡短，卻壓縮了最後一個游牧帝國的結局。¹⁰⁴其主要敘事如下：

準噶爾者，西北邊之雄強狡詐部落。近來彼等內部相互殺伐不止，傷害人眾之故，其大台吉車凌等人投誠，屢屢請求進兵。故於乾隆二十年大軍臨準噶爾界，準噶爾綽羅斯台吉達瓦齊躲避未敢相抗，我軍去擊，捉拿俘虜，於太廟獻俘後寬宥，封親王，居於京師。其餘厄魯特人等皆居於伊犁等地種田，統於將軍。將此稱之平定準噶爾厄魯特。¹⁰⁵

¹⁰² 《御製增訂清文鑑》，卷 3，旗分佐領類第二，頁 32-43。旗分佐領類的詞條，尚有高麗佐領、俄羅斯佐領、回子佐領三個和族群有關的詞條，此三佐領為內務府所管轄，本文暫不討論。見《御製增訂清文鑑》，卷 3，旗分佐領類第一，頁 31-32。

¹⁰³ 清單裡的「新投誠回子」條目，係指乾隆二十四年，霍集斯、和什克等回子投誠，賜封王、貝勒等爵位，其居於京師，為理藩院管轄。

¹⁰⁴ 《御製增訂清文鑑》，卷 3，旗分佐領類第二，頁 39。

¹⁰⁵ 滿文解釋拼音暫略，原文見《御製增訂清文鑑》，卷 3，旗分佐領類第二，頁 39b-40b。

這段敘事有幾個關鍵操作：一是它未以汗國或政權稱呼準噶爾，而將其界定為西北邊的「部落」，並加上「雄強狡詐」的道德標籤；二是把用兵原因完全歸咎於準噶爾內亂與「投誠台吉屢請進兵」，將征伐描繪為「被動的正義出師」，與清初多爾袞「應吳三桂之請」入關的宣傳手法如出一轍；三是釋文略去戰爭過程與焦著局勢，只強調達瓦齊不敢抵抗、俘獲獻俘與恩赦封王，並以「種田」、「統於將軍」一語，概括其中一部分人的生計安排，進而以伊犁將軍的管轄標示其戰後制度位置。

2. 詞條的時間刻度：從游牧到戰後安置

與此相比，《職貢圖》圖說中的厄魯特仍被描述為專事游牧、居無定所，必要時招回人耕種，顯然反映較早階段的狀態；《御製增訂清文鑑》則直接說他們「皆居於伊犁等地種田」。戰後厄魯特營一方面仍經營牧場，一方面因軍糧須自給而從事小規模屯田，「種田」確有其事。¹⁰⁶

由此可見，《職貢圖》圖像、圖說記錄的是征服前後的過渡樣貌，而詞條則是在征服完成、旗分與屯田制度確立後，以「平定準噶爾厄魯特」之名這種簡化與概括的辭書體例，把複雜且延續多年的軍事與制度變化，總結為一項已具明確名稱的歷史事件。

3. 「新投誠」詞條的公式化

緊接在「平定準噶爾厄魯特」之前的「新投誠準噶爾十六旗」（ice dahame jihe jun gar juwan ninggun gūsa），同樣採用高度公式化的筆法：先說準噶爾內訌、人眾流離，再寫杜爾伯特車凌等大台吉「景慕仁化」，率萬餘戶投誠；隨後交代車凌家族的「投誠」，把原本涉及準噶爾內部權力競爭、跨境遷徙、軍事形勢與政治談判的複雜過程，因而被概括為「亂離——投誠——受封——編旗」的連續程序。¹⁰⁷如此一來既宣示清朝武力與懷柔並行的合法性，也在八旗體制中為這些歸附者設置穩定的法律與行政身分。

¹⁰⁶ 馬大正、成崇德主編，《衛拉特蒙古史綱》，頁 333-334。

¹⁰⁷ 滿文解釋拼音暫略，原文見《御製增訂清文鑑》，卷 3，旗分佐領類第二，頁 39。

透過「新投誠」、「平定」這一前一後的詞條組合，《御製增訂清文鑑》不只是解釋詞義，而是在滿文詞書層面重寫準噶爾的歷史：從外在對手，轉化為已被分封、編旗、安置的「內部成員」。

（四）回部詞條與帝國內部成員的例外收錄

「平定回子」（*necihiyeme toktobuha hoise*）詞條不敘戰事，只說平定西域十餘城後，按舊俗授以伯克職官，仍由欽差大臣統轄；¹⁰⁸緊接其後的「進貢回子」則指每年由欽差自諸回城擇人赴京進貢者。也就是說，兩詞條概括的是戰後回部的伯克制、駐劄大臣統轄，以及定期赴京進貢等政治安排。¹⁰⁹

依制度性質而言，回部伯克制屬藩部體系與八旗旗分佐領有別，卻被一併置於《御製增訂清文鑑》設官部「旗分佐領類」中，這顯示該類目的實際收錄範圍超出八旗職官與佐領編制的狹義界限。這一較為寬泛的分類框架，因而並列記錄對新歸附及新征服人群所採取的編旗、設官、統轄與進貢等制度安排。

同類詞條尚有「哈密回子一旗」（*hami i hoise emu gūsa*）與「土爾番回子一旗」（*turfan i hoise emu gūsa*），分別指哈密回長脫離準噶爾、投誠清朝，以及額敏和卓抗準、編旗內徙瓜州之事，可分別與卷本《職貢圖》卷一末尾的哈密回民與肅州回民相互參照。前文根據《大清一統志》的分類與編排，已說明這兩組回民並非外國或外藩朝貢者，而是經歸附、編旗或內徙安置後，已納入清朝統治體系的帝國內部成員，此處更確認其「內附編旗」身分。它們又與伊犁群組、回部諸城一同出現在《職貢圖》第一卷，則進一步顯示該卷的收錄範圍並不能單純以「外國朝貢」或「外藩來朝」概括。

（五）征服結果的知識定型

乾隆朝《職貢圖》是在西域戰後不久完成的圖像史書，呈現的是清朝如何編制新納族群，並塑造其為「歸附帝國」的朝貢成員。卷一中伊犁群組的厄魯

¹⁰⁸ 滿文解釋拼音暫略，原文見《御製增訂清文鑑》，卷 3，旗分佐領類第二，頁 43；解釋內文列舉的回城包括：烏什、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阿克蘇、庫車、沙雅〔爾〕、賽里木、闕展、伊犁、庫爾勒、布固爾、拜、哈拉沙拉等。

¹⁰⁹ 滿文解釋拼音暫略，原文見《御製增訂清文鑑》，卷 3，旗分佐領類第二，頁 43b。

特、烏什與諸回城，實際上與《御製增訂清文鑑》中的「平定準噶爾厄魯特」、「平定回子」、「進貢回子」等詞條相互對應。在圖像裡，他們被排列進職貢畫卷；在辭書中，則被命名為征服與編旗的對象。

兩者的落差在於敘述方式。前者採用「伊犁等處民人」此類模糊稱謂，淡化準噶爾作為被征服主體的國名與政治記憶，使相關人群得以被納入「萬國來朝、遠人向化」的柔性意象；後者則在滿文權威辭書中，以「新投誠」、「平定」等條目，明白標示誰是戰敗者、誰被編旗、誰被納入藩部體系，將其身分固定在國家語彙與類目之內。

從兩者實際形成的知識效果來看，準噶爾與回部戰敗後的政治變化，確實分別透過人物圖像與歷史詞條獲得相對固定的表述。《職貢圖》在形式上雖是一部職貢畫冊，實際上卻成為平定西域的視覺檔案。與此同時，《大清一統志》的增修、《御製增訂清文鑑》相關詞條的增列，以及旗分、伯克、駐劄大臣等制度的建立，分別從地理編纂、語彙分類與行政設置等層面，重新安置征服後的人群與地域。清朝不僅完成了對被征服者的行政編制，也在象徵層面，將自身塑造成「四裔環繞」的中央之國，呼應了前文對《職貢圖》命名與西域轉向的整體論述。以下將說明這種政治意圖如何透過圖像之間的轉化與知識體系的整合而得以實現。

六、成為中央之國——《職貢圖》西域群體的再現與延伸

（一）圖像的虛構與擴張：從職貢到政治敘事

1. 圖像清單的轉化：西域群體的擴增與地域凸顯

本節關注的是：《職貢圖》的成員清單如何被後續政治圖像「引用」並加以虛構擴大，以及清朝又如何透過輿圖與經典地理的重釋，來為「入主西域的中央之國」奠定合法性。現實中同時進京朝貢的邦國數量十分有限，遠不及理想中的「萬國來朝」，於是繪畫成為最有效的具體化工具。《職貢圖》的清單

遂被轉化、衍生為《萬國來朝圖》、《平定西域獻俘禮圖》等作品中成群的貢使隊伍，高舉國名、族名之旗幟出現（附圖 2、3）；同時，將這些職貢成員所代表的地域標示在輿圖上，也是將清單具象化的另一種方式。

臺北故宮所藏傳謝遂本《職貢圖》卷一中，內亞成員多達三十餘組，接近全卷之半。在《萬國來朝圖》與徐揚《平定西域獻俘禮圖》中，此種擴張更為明顯：原本《職貢圖》中烏什、庫車、阿克蘇等城只是各一組回人／回民形象，到了後兩者，則膨脹為烏什、庫車、阿克蘇、葉爾羌、和闐等各自持旗的隊伍，既堆疊出龐大的來朝陣容，又強化了南疆諸城的地域感。徐揚卷中更加入西藏、關東等群組，顯示出一種刻意的「全域性」安排。與此同時，自乾隆年間三度測繪西域而成的《內府輿圖》¹¹⁰及其他新疆輿圖、全球地圖，則在空間層次上呼應這一圖像擴張，使西域成為疆域想像中的關鍵空間。

2. 從《職貢圖》到《萬國來朝圖》：形象的統一與矛盾

《職貢圖》伊犁群組並置了厄魯特與伊犁回人，既要呈現征服厄魯特的戰果，也要呈現對內附回人的懷柔。然而，伊犁厄魯特實際並未赴京朝覲，《平定西域獻俘禮圖》卻把伊犁厄魯特、伊犁回人都畫入獻俘儀式，以製造更多西域成員列席的視覺效果。更晚一點的軸畫《萬國來朝圖》，則把近四十個屬邦部族朝貢團壓縮在太和門或寧壽門前，形成極為密集的視覺焦點。

在《萬國來朝圖》中，伊犁旗幟下的貢使形象被進一步「統一」為厄魯特蒙古。雖然四幅《萬國來朝圖》中人物面貌略有差異，如編號故 6273 這一幅呈現圓高目深鼻狀，其他三幅則面目細白、圓臉且細緻，但帽式是關鍵識別：依《職貢圖》圖說，伊犁厄魯特台吉、宰桑戴的是紅纓高頂氈帽或捲邊皮帽，伊犁回人則戴紅頂貂帽，兩者差異明顯。¹¹¹因此，《萬國來朝圖》中伊犁旗幟下的帽式，實際上都指涉厄魯特，而非伊犁回人（附圖 4）。

¹¹⁰ 郭美蘭，〈乾隆年間西北地方三次繪圖始末〉，《滿語研究》，2013 年第 1 期，頁 139-144；靳煜，〈清乾隆年間西域測繪再考察〉，收入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歷史地理》編輯委員會編，《歷史地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輯 30，頁 249-266；靳煜，〈乾隆年間三次西域測繪再分析〉，《西域研究》，2016 年第 1 期，頁 27-34。

¹¹¹ 莊吉發，〈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頁 129、131、135。

更耐人尋味的是對南疆回部成員的處理。《萬國來朝圖》裡，烏什、庫車、阿克蘇等回人的帽式反而接近伊犁厄魯特，與《職貢圖》中所記「頭裹錦巾」或「戴小白帽」大相逕庭。¹¹²換言之，畫師刻意弱化了南疆諸城獨特的穆斯林服飾特徵，在視覺上把他們「厄魯特化」，讓一整片西域隊伍看上去都像是新征服地的同質群體（附圖 5）。這種統一化處理，不僅方便觀者在視覺上辨識「新西域」，也是一種藉厄魯特形象來遮蔽回部差異的政治操作。

3. 《平定西域獻俘禮圖》：極西與極東的政治性並置

徐揚《平定西域獻俘禮圖》沿用《職貢圖》卷一、卷二的成員清單，但改以獻俘儀式串連。畫卷所描繪的是平定回部後，巴達克山將霍集占首級送交清軍，隨後由富德函送京師，聯同被俘回酋，在北京舉行告祭與獻俘。畫面從長安門到午門，鋪排的是官員、貢使與觀禮人群的長隊。¹¹³霍罕、巴達克山等部的使臣當時的確在京師參與儀式，¹¹⁴此卷並著錄於《石渠寶笈續編》，顯示其在宮廷宣傳中的重要地位。¹¹⁵畫卷中的徐揚題跋還列出一串朝貢藩屬清單，可以說，此圖是以獻俘主題的《萬國來朝圖》長卷版本，旨在呈現萬國朝賀清朝已成功入主西域的盛大場面。

卷中可見兩個關鍵的圖像安排。其一是西域成員的細分：畫上分別以旗幟標示「伊犁」的厄魯特人與「塔爾奇察汗烏蘇等處回人」，後者人物衣冠與《職貢圖》記載大致相符，但現在被納入同一獻俘場景（附圖 6）。其二是內部成員的擴增：畫卷增繪西藏群組的若干成員（補魯克巴、巴埒卡穆、密尼雅克），

¹¹² 莊吉發，《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頁 141。〔清〕佚名，《萬國來朝圖》軸，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故 6273，雖將帽頂改用白色，仍是厄魯特帽式。

¹¹³ 關於徐揚《平定西域獻俘禮圖》內容簡介及圖版，參見劉如仲，〈平定西域獻俘禮圖研究〉，收入易蘇昊、樊則春主編，《五臺山人藏：徐揚畫平定西域獻俘禮圖》，無頁碼。圖中繪有題寫獻俘、獻馘二面紅旗。

¹¹⁴ 巴達克山、博羅爾等使臣參與儀式、筵宴，參見《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604，乾隆二十五年正月丙辰（十日），頁 785；正月丁巳（十一日），頁 785。

¹¹⁵ 〈徐揚畫平定回部獻俘禮圖一卷〉，見《欽定石渠寶笈續編》，冊 2，頁 343。又《平定西域獻俘禮圖》的朝貢成員，按照《石渠寶笈續編》的著錄，除了未見「亞利晚」，其餘基本上和《萬國來朝圖》一致。

以及關東七族（如鄂倫綽、赫哲、庫野等），把原本屬於《職貢圖》第二卷的邊民，與外藩使團並置於同一長卷之中。

這種安排使畫面呈現出一種橫貫東西兩極的空間效果。西藏邊外諸部雖未直接遣使北京，因附於西藏而被視為廣義的西域成員；關東諸族則散居東海沿岸與北方海島，如庫頁島一帶的「庫野」（阿伊努人），是清朝極東的邊民。¹¹⁶

《平定西域獻俘禮圖》將帝國極西的西域成員與極東的海邊、海島諸族同時納入觀禮序列，以視覺方式宣示疆域規模。

總結而言，《職貢圖》的成員清單成為一個可反覆調度的「素材庫」，在《萬國來朝圖》、《平定西域獻俘禮圖》中透過反覆抽取、重組與增衍，呈現帝國空間的象徵性輪廓。而當清廷進一步透過輿圖、山川與水系描繪西域時，這種以中央統攝四方的秩序又如何獲得地理上的說明？西域如何與西藏、蒙古及中土相連，其極西邊界又如何藉由山脈與河流被推展至「西海」？「西海」如何存在？這便需要轉向清代新疆輿圖中的地理表述。

（二）入主西域的輿圖呈現：中央之國的地理建構

現存《新疆總圖》大約定型於嘉慶年間，是清朝統治新疆的代表性輿圖之一（附圖 7）。¹¹⁷它與南北路、伊犁各區總圖及諸城分圖合為一套，南上北下，強調道路、城池與山川水系，並標示西藏、哈薩克、布魯特等周邊藩屬。¹¹⁸透過這套輿圖，西域被完整納入清朝地理體系之中。

¹¹⁶ 林士鉉，〈極東邊民——《皇清職貢圖》裡的庫野〉，《民族學界》，期 45（2020 年 4 月），頁 107-158。

¹¹⁷ 陳維新文字撰述，李天鳴、林天人主編，《失落的疆域：清季西北邊界變遷條約輿圖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0），頁 71。圖中多處古今地名並置，例如，「哈薩克，古康居」，「安集延，古大宛」，「伊犁，古烏孫」，「羅布淖爾，古蒲昌海」等，此種古今地名對照，不僅反映清廷對西域地理知識的考訂，更透過當代疆域與古籍地名的對應，將新征服的西域納入中國傳統天下地理與王朝歷史敘事之中。

¹¹⁸ 《新疆總圖》、《北路總圖》、《巴里坤輿圖》、《古城輿圖》等十餘幅尚有其他版本，彩繪紙本《新疆圖說》典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共十九幅冊頁，一圖一說，圖版參見陳維新，《失落的疆域：清季西北邊界變遷條約輿圖特展》，頁 69-81。中國國家圖書館亦藏有一部，今名《西域輿圖》，共十七幅；墨繪紙本《新疆圖》，典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十九冊（推蓬裝方幅式）。這批輿圖亦可見於松筠等奉敕撰《欽定新疆識略》各卷。

1. 山脈：由西藏發脈、經西域展開的「天下山脊」

《新疆總圖》上方註有：「一帶皆蔥嶺，發脈於僧格喀巴布山，通西藏。」¹¹⁹這短短一句，其實是對青藏高原——西域山脈實測的高度濃縮。清廷的認知是：天下群山統宗起脈於西藏極西的岡底斯山；其西北支脈為僧格喀巴布等山，繞阿里北上，至西域即為蔥嶺，再向東分為南北兩大幹支，延伸至中土與喀爾喀蒙古。¹²⁰將僧格喀巴布標為「發脈」所在，實際上便是把西域西南緣安置在天下山脈發脈、分支與延伸的關鍵位置，也是聯通西藏、中原與蒙古的樞紐。

2. 水系與河源：黃河伏流於西域及「西海」之謎

圖右上標出圖伯特、克什米爾，以及「雅布哈爾水西流千餘里，入西海」。徐松等人的考察指出，此處圖伯特並非衛藏，是和克什米爾用來指通向今北印度、巴基斯坦一帶的巴勒提、痕都斯坦、博洛爾、拔達克山、愛烏罕等部的地理標誌。¹²¹雅布哈爾水與葉爾羌河同源於坎巨提山西麓，西注雷轟海，「即西海」。¹²²雷轟海是古名，「西海」則更具象徵性，可能指裡海、鹹海乃至更遙遠的外海，是清代地理知識為西流水系指定的遠方歸宿；其象徵意義，在於把新疆南緣的水道繼續向帝國版圖之外延伸。

圖左上則繪出星宿海、鄂凌淖爾、扎凌淖爾、阿勒坦郭勒（黃水）等，¹²³指向青藏高原的黃河上源。乾隆朝河源實測試圖證明「河源總發西域」：¹²⁴認

¹¹⁹ 陳維新，《失落的疆域：清季西北邊界變遷條約輿圖特展》，頁 71。

¹²⁰ 《西域圖志校注》，卷 2，〈西域山脈圖說〉，頁 89；松筠等奉敕撰，《欽定新疆識略》，卷 1，〈新疆疆域總敘〉，頁 6。

¹²¹ 〔清〕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記（外二種）》（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51。徐松於書中描述葉爾羌河之西源流向，及各部方向、日程；《新疆總圖》所記的圖伯特，為蒙古語 *töbed*，原指西藏，徐松記為巴勒提（今克什米爾巴提斯坦）南方之部，「即藏地也」。《西域圖志》亦於巴勒提東側標注土伯特，見《西域圖志校注》，卷 2，愛烏罕等部圖，頁 103；卷 46，藩屬三，頁 593。因此，這裡的圖伯特不是指衛藏。

¹²² 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記（外二種）》，頁 52，雅布哈爾水一作雅布塔爾水，徐松對此水及西流所至引自《水經注》，而蔥嶺東西兩側水系流向，引自《涼土異物志》；徐松，《漢書西域傳補注》，收入《西域水道記（外二種）》，頁 416、434。徐松認為，雅布哈爾水並非大河，是否可具體對應今日某水域，尚待考察。

¹²³ 〔清〕紀昀等奉敕撰，《欽定河源紀略·提要》，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579，卷首，頁 10-12。又參見卷首，〈御製河源詩〉，按語，頁 3。

¹²⁴ 《欽定河源紀略》，卷 1，〈蔥嶺河源圖說〉，頁 17。

爲回部最大湖泊羅布淖爾（今稱羅布泊）爲黃河西來伏流之所，再如同「濟水三伏三見」東出積石山，¹²⁵終於成黃河。¹²⁶這一說法把傳統「星宿海爲河源」的格局更往西推，視黃河源頭與西域內湖水系爲一體。

這種連結顯示當時在知識分類上採取較廣義的「西域」框架。乾隆二十八年敕纂《西域同文志》，便以「西域」涵蓋天山北、南路、青海與西番等區域，其中「西番」又按衛、藏、阿里、喀木等區域分列，¹²⁷與《職貢圖》圖說裡「西藏所屬衛、藏、阿哩、喀木諸番民」的範圍大致相合。

3. 全球視野下的西域定位：從「大地直北」到「西方之盡」

《西域圖志》所附〈皇輿全圖說〉，更從「大地」（以歐亞爲主的世界）角度界定西域：「中華當大地之東北，西域則中華之西北，爲大地直北境也。自嘉峪關西，迄準部回部，外列藩部，圓廣二萬餘里，其疆圉之闊遠，幾與中土埒。」¹²⁸一方面強調西域疆域之廣，幾與「中土」相當；另一方面則把西域定位爲「大地直北境」，即歐亞中心帶的北緣腹地。換言之，只要西域在清朝掌握之內，清朝便是歐亞大陸中央地帶的政治核心。

這種認知在全球圖像中也獲得呼應。乾隆年間莊廷蓁繪《大清統屬職貢萬國經緯地球式》，¹²⁹圖中「大清」二字直接壓寫在巴里坤、烏魯木齊、關度等

¹²⁵ 《西域圖志校注》，卷 2，〈西域山脈圖〉，頁 91。

¹²⁶ 《欽定河源紀略》，卷首，〈御製河源詩〉，按語，頁 4：「蓋昆侖在今回部中，回部諸水皆東注蒲昌海，即鹽澤也。鹽澤之水皆入地伏流，至青海始出，則星宿海諸水皆是也！而大河之源獨黃色爲靈異，更在星宿海之上。非昆侖之水伏地至此以出，而挾星宿海諸水爲河瀆而何？濟水三伏三見，此亦一證矣。」此段臣工按語表明當時君臣採用漢代以來的黃河「重源說」（伏流說），解釋黃河「靈異」的黃色，並以「濟水三伏三見」作爲理論支撐。

¹²⁷ 《欽定西域同文志·提要》，頁 2。

¹²⁸ 《西域圖志校注》，頁 59。

¹²⁹ 《大清統屬職貢萬國經緯地球式》，美國國會圖書館地理地圖部藏，圖版見《數位方輿》，https://openmuseum.tw/muse/digi_object/56655a4f8a52bf967a0de609e51a2b4f（2022 年 5 月 20 日檢索）。《大清統屬職貢萬國經緯地球式》包含《內板山海輿地全圖》、《海國聞見錄四海總圖》及《大清統屬職貢萬國經緯地球式》三圖式及相關說明文字。此美國國會圖書館藏彩繪本內容顯示乾隆五十九年「莊廷蓁謹輯圖說」，其他版本則多顯示「嘉慶五年」。相關版本圖像，參見 Richard Pegg, "Zhuang Tingfu: Cartographic Encounters and Echoes." Leventhal Map & Education Center at the Boston Public Library, July 30, 2021, <https://www.leventhalmap.org/articles/zhuang-tingfu/> (accessed July 12, 2026).

西域地名之上，〈題記〉又稱大清為「亞細亞一州之域」，¹³⁰正因入主西域，擴大了大清在亞洲圖景中據以統攝周邊區域的地理基礎，清朝成為「亞細亞」的核心國家。製圖者在接受五洲地理的同時，仍以大清及其政治關係重新組織亞洲空間（附圖 8）。〈題記〉中所稱《欽定職方會覽》為主要地名來源，¹³¹極可能指的正是清宮《職貢圖》系統的某一版本，顯示職貢清單與全球經緯圖的直接關聯。

嘉慶年間流傳廣泛的《大清萬年一統天下全圖》，則以變形中國圖式呈現強烈的「東西臨海」意象：圖左上標出大西洋、小西洋及諸島，西洋右側陸地僅以「伊犁」一名概括整個西域——中亞地帶，形成一幅「大清居中、東西俱臨大海」的地景構圖（附圖 9）。這種視覺效果並非全然脫離官方地理知識。乾隆朝《皇朝通典》談及職方、藩服，「環集輻湊」，已稱疆域「無邊之可言」。¹³²在羅列西側藩屬時，不但包括布魯特、安集延、塔什罕、拔達克山、博洛爾、愛烏罕等中亞群體，甚至將意達里亞（義大利）、博爾都噶爾亞（葡萄牙）也納入。¹³³更重要的是，《皇朝通典》提出「愛烏罕諸國實鄰西海，西方之地至此已盡」之說，¹³⁴將極西藩屬愛烏罕視為「西方之終」，與「西海」銜接。如此一來，從西海至東海，整個歐亞內陸都被吸納在大清及其藩屬的輿圖想像之中，「中央之國」也因此獲得一套橫跨內亞與外洋的地理證成。

¹³⁰ 《大清統屬職貢萬國經緯地球式》，〈題記〉：「西北開疆數萬里，東南則薄海外重洋而郡縣之。伏見御製天球、地盤，賅確詳備，然第全地中亞細亞一州之域，此圖內大清國也。」關於五大洲，「亞細亞者，為中土大清國」，「黑海」為西至之一部分；而歐邏巴「東至黑海」，似指此黑海是歐亞交界處，惟這裡無法細究「黑海」的地理和象徵意涵。

¹³¹ 《大清統屬職貢萬國經緯地球式》，〈題記〉：「如外彝名稱，悉遵《欽定職方會覽》、《四彝圖說》等書之現今名稱列入，間或旁附以舊名，便於攷覈同異。」關於《職方會覽》概況及其與《職貢圖》的關係，參見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75，頁 9-13。

¹³² [清]嵇璜等奉敕撰，《皇朝通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43，卷 97，邊防一，頁 1-2。

¹³³ 《皇朝通典》，卷 97，邊防一，頁 3。原文先說明「朝獻之列國、互市之群番、革心面內之部落，顛顛向化，環四海而遠重洋」，繼而羅列東、西、南、北四面國家、部族。其中清朝的正北外國僅有俄國，但《皇朝通典》考量哈薩克雖非正北之地，因在「伊犁北境，與俄羅斯國壤地相鄰」，故置於同卷。見《皇朝通典》，卷 100，邊防四，頁 2b。

¹³⁴ 《皇朝通典》，卷 99，邊防三，頁 2b。

4. 經典地理的重新詮釋：「流沙」變為「岡底斯山」

上述「新西域」與「中央之國」的觀念，並不限於當代圖像與輿圖，也反向進入了對儒家經典的翻譯與詮釋。以《尚書·禹貢》為例，傳統理解「流沙」為天下西界，由此形成「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的格局，長期以來是中國疆域上限的象徵。¹³⁵傳統上，流沙被視為西界所止，被總結為「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¹³⁶顧頡剛已指出「流沙」為古今爭訟之點，原意可能為弱水西流之後不知所終的傳說，或被古人比附為「西海」。¹³⁷

乾隆朝的邊疆實測，卻為「流沙」賦予新解。滿文譯本《尚書·禹貢》將「流沙」譯作 g'angtiša，¹³⁸即岡底斯山；滿文直接音譯自藏文 gangs ti se。¹³⁹這一譯法直接把「西界之極」對應青藏高原的實地山脈，反映了康熙年間對西寧、拉薩乃至岡底斯山進行實測繪圖的知識流傳現象（附圖 10）。¹⁴⁰並與《西域圖志》所述「天下諸山皆發脈於岡底斯山」相互呼應。¹⁴¹《皇輿全覽圖》亦將岡底斯標於圖上，使其成為經典與實測兩套知識的交會點。¹⁴²

¹³⁵ 江灝、錢宗武譯注，周秉鈞審校，《今古文尚書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 年二版四刷），頁 85。合黎山在今甘肅山丹、張掖、高台、酒泉四縣北面；居延澤在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的嘎順諾爾湖和蘇古諾爾湖。

¹³⁶ 江灝、錢宗武譯注，周秉鈞審校，《今古文尚書全譯》，頁 88。

¹³⁷ 顧頡剛注釋，《禹貢》，收入侯仁之主編，《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第 1 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頁 36-37、53。顧氏對「聲教訖於四海」的注釋：「禹貢文中只有東海、南海，而沒有北海、西海，蓋古人以為九州大陸東南西北四方都被海所包圍，如古人指北方沙漠為瀚海，楚辭離騷說：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那麼西方的流沙就是西海了。禹貢的地理知識，除東海外，南、北、西三面的海，都出自理想。」參見頁 53。

¹³⁸ 清高宗敕譯，《御製繙譯書經》，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85，卷 2，頁 14a，「餘波入於流沙」；卷二，頁 20a，「西被於流沙」。此滿文譯本序於乾隆 25 年 5 月初 4 日，〈御製序〉，頁 6a。

¹³⁹ 岡底斯山在今西藏自治區西南部普蘭、仲巴、昂仁、南木林等縣境內。岡，意為雪；底斯，梵語，也為雪意。東接念青唐古拉山，平均海拔約六千公尺，是內陸水系與印度水系的分水嶺。主峰岡仁波齊峰，海拔 6,656 公尺，亦是著名佛教聖地。參見武振華主編，《西藏地名》（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6），頁 159。

¹⁴⁰ 孔令偉，〈欽差喇嘛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清代西藏地圖測繪與世界地理知識之傳播〉，《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92 本第 3 分（2021 年 9 月），頁 603-648。

¹⁴¹ 鍾興麒等校注，《西域圖志校注》，卷 2，〈西域山脈圖說〉，頁 89；〔清〕松筠等奉敕撰，《欽定新疆識略》，卷 1，〈新疆疆域總敘〉，頁 6。

¹⁴² 必須指出的是，《皇輿全覽圖》所標示的滿文岡底斯山，g'angdisy alin，與滿文《書經》裡的拼寫稍有差異。《滿漢合璧清內府一統輿地祕圖》（瀋陽：奉天故宮博物館，1929，據康熙五

換句話說，當「流沙」被比勘為岡底斯山時，古典九州的西界已被推展至天下山水根源之處——西域。於是，無論是全球圖或是對《禹貢》「流沙」的重新詮釋，清朝都藉由「納入西域」來論證自家既是傳統中國的中心，也是歐亞大陸的中央之國。

（三）不存在的群體與被書寫的歷史

再回到《新疆總圖》合冊中的《伊犁輿圖》，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圖像如何處理戰後的厄魯特人口。圖上在特克斯河以東與空吉斯河一帶標明「厄魯特下五旗」，在伊犁河南岸與察林河、格根河附近標明「厄魯特上三旗」與「一帶厄魯特卡倫」（附圖 11），¹⁴³實際上就是以旗制地標呈現伊犁八旗駐防的空間格局，其中厄魯特營的一部分成員，正對應於《職貢圖》卷一中的「伊犁等處民人」。

伊犁駐防八旗由多路兵力組成：一是自涼州、莊浪、西安抽調的滿洲、蒙古官兵編成滿營；二是從黑龍江、張家口、盛京等地調來的察哈爾營、索倫營、錫伯營；三是原屬準噶爾的厄魯特人，被編為厄魯特營。¹⁴⁴厄魯特營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始正式編佐領，右翼下五旗初設六佐領，後增為十佐領，其人來源包括：清軍用兵時逃入哈薩克、布魯特的準噶爾人，戰後陸續被送回舊地；以及戰亂中被回人收養、後由官府贖買，遷往伊犁安置的厄魯特人。¹⁴⁵厄魯特

十八年[1719]本銅版複製），五排六號，頁 36；另參《康熙皇輿全覽圖》，收入汪前進、劉若芳編，《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此本排號為「三排六號」，應是圖次錯排的結果。

¹⁴³ 圖中尚標注「一帶察哈爾卡倫」、「一帶索倫卡倫」等駐防。陳維新，《失落的疆域：清季西北邊界變遷條約輿圖特展》，頁 81。

¹⁴⁴ 定宜庄，《清代八旗駐防研究》（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3），頁 96-99。另外也有攜眷屯種之綠營兵。厄魯特營建置及規模概要，參見：馬大正、成崇德主編，《衛拉特蒙古史綱》，頁 328-333；《欽定新疆識略》，卷五，頁 18b-23b。

¹⁴⁵ 馬大正、成崇德主編，《衛拉特蒙古史綱》，頁 329-330。右翼下五旗即：鑲白旗、正紅旗、正藍旗、鑲紅旗、鑲藍旗；游牧於崆吉斯河（今鞏乃斯河）、喀什河流域，今尼勒克縣、鞏留縣境；也包括乾隆三十六年隨土爾扈特部東返的沙比納爾（喇嘛的下屬），及厄魯特人。厄魯特左翼上三旗，即鑲黃旗、正黃旗、正白旗，編為六佐領；其來源為由熱河攜眷移駐的準噶爾達什達瓦部，及在京厄魯特官兵，分布在特克斯河以西、察林河、大小霍諾海等地，今昭蘇縣境。

營設總管、副總管與佐領等官職，完全納入清朝八旗官制，與原先以台吉、宰桑領民的蒙古社會組織已是不同體系。¹⁴⁶

然而，當我們把這種「戰後重編」與《職貢圖》的圖像對照，就會發現一個強烈落差：伊犁厄魯特傳統社會在第二次平定準噶爾戰後已遭摧毀，《職貢圖》伊犁群組所呈現的「伊犁台吉—宰桑—民人—回人」四級結構，在戰後的伊犁社會中其實不復存在。換言之，《職貢圖》再現的這一群體，在現實中並不存在，它再現的是一個已被戰爭抹去的群體結構。這些「不存在的群體」，不僅占據卷一要位，還在《萬國來朝圖》、《平定西域獻俘禮圖》中被重新召喚出場，成為獻俘、萬國來朝場景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七、結論：準噶爾如何成為「消逝的存在」？

乾隆朝《職貢圖》是在平定準噶爾與回部的過程中逐步定型的圖像知識工程，而非單純承襲職貢傳統。與其將其置於「西洋轉向」脈絡，不如視為清帝國的「西域／內亞轉向」：其增繪、卷帙變化與成員編排緊扣西域戰爭進程，與《萬國來朝圖》等圖畫和輿地圖志共同構成將征服轉化為天下秩序的視覺與知識體系。此轉向可謂重新界定了「中國」疆域與族群關係，清廷藉由拆解準噶爾故地與人口、重編回部與回人序列，以「職貢」之名實現四裔環繞的古典天下圖景，使清朝「再次成為中國」。這不僅是圖像的擴張，更是「中國」概念自身的擴張。帝國透過精密的圖像與文本操作，將異域的準噶爾汗國抹除、重塑並吸納為版圖的一部分，透過征服、編制與再現，重新占據「中央之國」的政治、文化與地理位置，使《職貢圖》成為近代國家認同根源的重要帝國記憶。

西域戰爭前，準噶爾所屬的厄魯特人群原是境外政治實體與朝貢對象；戰後卻在《職貢圖》中以多重交錯的「內部」身分重新出現。這包括伊犁群組的

¹⁴⁶ 《欽定新疆識略》，卷 5，頁 19-21a。

台吉與民人、東歸安置的土爾扈特。再加上居於甘肅而被納入西域回人序列的哈密、肅州回民，雖然其制度位置不同（部分編入總管旗制或佐領，部分為藩部），但在《御製增訂清文鑑》「旗分佐領類」中，化為「平定準噶爾厄魯特」等詞條者已將戰爭、被征服族群與行政編制緊密聯繫。彷彿他們成為本不屬傳統職貢對象的旗分內部成員，卻因西域已整併入中國的政治局面而被納入《職貢圖》，成為其最特殊的群體。其中尤以伊犁群組為關鍵：它標示平定西域的起點，又預示隨後數個回城與中亞部族政權的朝貢次第，與後來仿其篇目架構繪入的土爾扈特群組，共同構成天山北路的「準噶爾衛拉特部」，又與天山南路回部、西藏群組等相對映，呈現被內嵌於清朝疆域中的內亞、西域群體。

職貢成員原本多以文字清單呈現，經《職貢圖》轉化為成對人物，並在《平定西域獻俘禮圖》與《萬國來朝圖》中重組為綿延於京城朝會的盛大景象。如烏什、庫車等回城，即由二組成對男女擴展為多城人群同時在場的盛景。這種圖像轉化不僅放大視覺效果，更重新安排了群體位置。準噶爾作為獨立政權與歷史主體，遂在「萬國來朝」的敘事中悄然消失；其人口殘影，則以「伊犁」旗幟、旗營、詞條等形式，存留於「中國」想像的邊緣。這種政治主體性遭到抹除、成員形象卻被反覆召喚以證明一統秩序的矛盾狀態，正是準噶爾成為「消逝的存在」的根本原因。

附表 1 《職貢圖》卷本卷一、《萬國來朝圖》、《大清一統志》相關成員對照表

圖次	篇目名稱	謝遂 職貢 圖卷	皇清職貢圖 (內府刊本)	皇清職貢圖 (四庫寫本)	萬國來朝圖	大清一統志 (乾隆九年刊本)	大清一統志 (乾隆四十九 年四庫寫本)
1 至 37	朝鮮國夷官至 亞利晚國夷人	卷一	卷一	卷一	除職貢圖之 大西洋國黑 鬼奴、大西 洋國夷僧女 尼外，各國 均有。	卷 353-356 朝貢諸國，除土 爾古特、葉爾欽 外，歐亞國家計 29。	卷 421-424 朝貢諸國，歐 亞國家計 28。
38 至 43	西藏群組 38-44 (西藏所屬)番民 番人、魯卡補札 番人	卷一	卷二	卷二		卷 352 (蒙古屬國)西藏	卷 413 西藏
44	巴勒布大頭人 並從人(即廓爾 喀)	卷一 乾 隆 54 年 補入	卷九				
45 至 47	伊犁等處台 吉、宰桑、民人	卷一	卷二	卷二	伊犁		卷 415 伊犁
48	伊犁塔爾奇查 汗烏蘇等處回 人(內有葉爾奇 木、喀什哈爾、 阿克蘇、庫車、 呼騰)	卷一	卷二	卷二	葉爾羌、喀什 哈爾、阿克 蘇、庫車		卷 418 庫車、阿克蘇 卷 419 喀什噶爾、葉 爾羌
49 至 50	哈薩克頭目、 民人	卷一	卷二	卷二	哈薩克		卷 420 左、右哈薩克
51 至 52	布魯特頭目、 民人	卷一	卷二	卷二	布魯特		卷 420 東、西布魯特
53 至 54	烏什庫車阿克 蘇等城回目、回 人(內有和闐)	卷一	卷二	卷二	烏什、庫車、 阿克蘇、和闐		卷 418 庫車、阿克蘇 卷 419 烏什、和闐
55 至 56	拔達山回目、 回民	卷一	卷二	卷二	拔達克山		
57 至 58	安集延回目、 回民	卷一	卷二	卷二	安集延		

乾隆朝《職貢圖》的西域成員構成與西征準噶爾後的西域表述

59	安西廳哈密回民	卷一	卷二	卷二		卷 351 哈密	卷 417 哈密
60	肅州金塔寺魯古慶等族回民 (俱土魯番部落)	卷一	卷二	卷二		卷 351 土魯番	
61	愛烏罕回人	卷一 乾隆 28 年 補入	卷九	卷九			
62	霍罕回人	卷一	卷九	卷九			
63	啟齊玉蘇部努喇麗所屬回人	卷一	卷九	卷九			
64	啟齊玉蘇部巴圖爾所屬回人	卷一	卷九	卷九			
65	烏爾根齊部哈雅布所屬回人	卷一	卷九	卷九			
66 至 68	土爾扈特台吉、宰桑、民人	卷一 乾隆 36 年 補入	卷九	卷九			
69	整欠頭目先邁岩第	卷一 乾隆 40 年 補入	卷九	卷九			
70	景海頭目先綱洪	卷一 乾隆 40 年 補入	卷九	卷九			
					哈爾沙爾		卷 418 哈喇沙爾

附表 2 《御製增訂清文鑑》設官部旗分佐領類各族簡介一覽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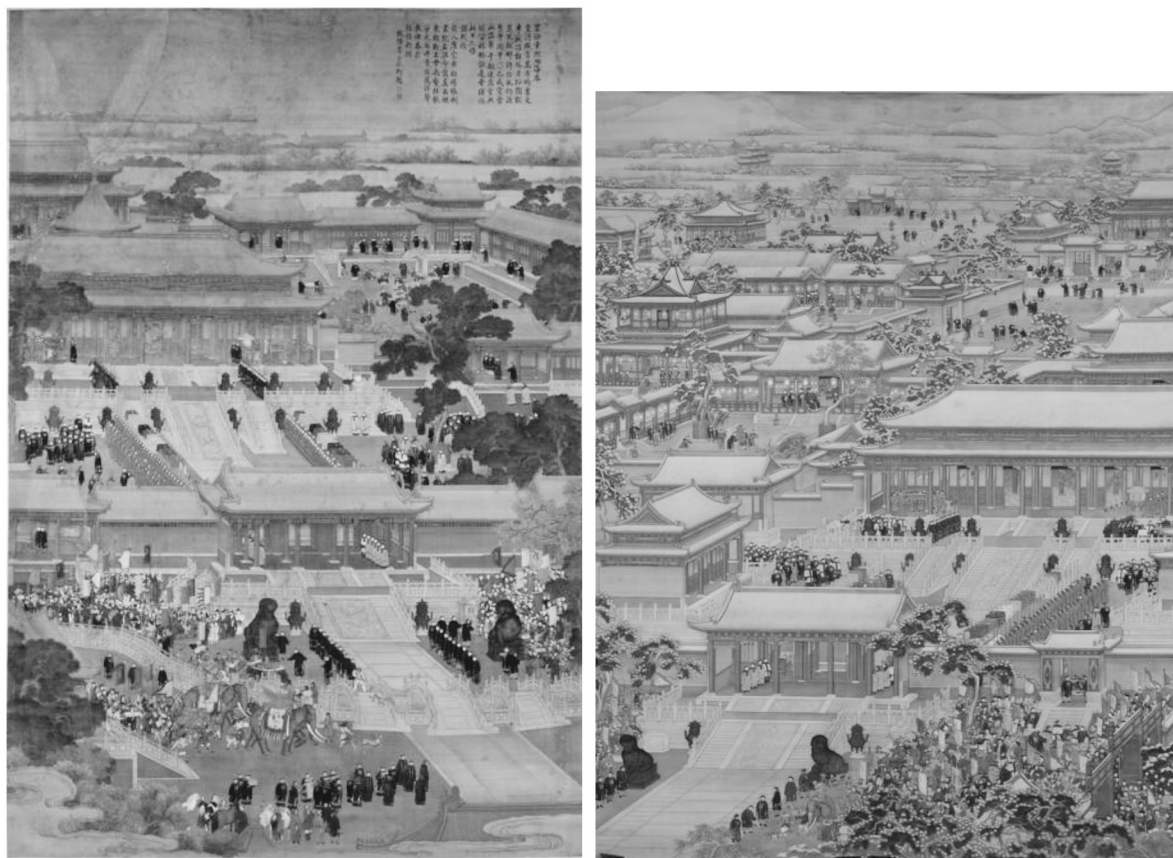
	漢文詞條	滿文詞條	備註(滿文解釋內容要點)
1	高麗佐領	solho niru	清朝草創時期自朝鮮歸附編旗者
2	俄羅斯佐領	oros niru	順治、康熙年間歸附的俄羅斯人
3	回子佐領	hoise niru	來降回子中的金匠、樂手等
4	察哈爾八旗	cahar jakūn gūsa	清太宗時期投降之察哈爾蒙古
5	四十九旗	dehi uyun gūsa	康熙《御製清文鑑》亦載。 漠南蒙古(內蒙古、內扎薩克蒙古)各地,包括科爾沁六旗、鄂爾多斯七旗等編成四十九旗。
6	歸化城土默特二旗	huhu hoton i tumet juwe gūsa	清太宗時期將歸化城一帶之土默特蒙古編為左右兩翼二旗。
7	八十六旗	jakūnju ninggun gūsa	康熙《御製清文鑑》原作五十七旗 滿文解釋首先說明因厄魯特入侵,康熙皇帝出兵,其後將喀爾喀蒙古編作八十六旗。
8	附隸八旗厄魯特	jakūn gūsa de kamcibuha ūlet	康熙《御製清文鑑》亦載。 滿文解釋首先說明厄魯特噶爾丹之暴行,康熙帝三次親征討滅,收噶爾丹其下四散逃竄人等編為旗佐,附於八旗。
9	青海三十旗	huhu noor i gūsin gūsa	滿文解釋首段沿襲康熙《御製清文鑑》朝貢厄魯特之內容。康熙年間準噶爾車凌旺布率眾來降,及青海厄魯特和碩特部扎什巴圖爾等人入覲朝貢。 其後說明雍正年間,將青海之厄魯特、土爾扈特編成青海三十旗。
10	阿蘭善山厄魯特一旗	alašan i ūlet emu gūsa	康熙三十六年設置,令來歸之青海和碩特額實汗孫,巴圖爾額爾克濟農,賜牧阿拉善,即賀蘭山地方。
11	西藏唐古特蒙古	wargi dzang ni tanggūt monggo	雍正年間,達賴喇嘛之父索諾木達爾扎及頗羅鼐家族,皆賜封公,將達木地方之蒙古編佐領,為駐藏大臣管理。
12	土爾扈特一旗	turgūt emu gūsa	土爾扈特汗阿玉氣之弟那雅爾瑪木特,其子阿喇布珠爾來附,康熙四十三年,賜封固山貝勒。乾隆十八年,編旗佐,其孫羅卜藏達爾扎賜封貝勒,居甘州界外,為總督管理。
13	新投誠準噶爾十六旗	ice dahame jihe jun gar juwan ninggun gūsa	(乾隆十八年)準噶爾大台吉杜爾伯特車、車凌烏巴什、車凌孟克等率萬餘戶口投誠,同輝特台吉達瑪璘等分封汗、王、貝勒、公、台吉等,編為旗佐。
14	平定準噶爾厄魯特	necihiyeme tokto buha jun gar i ūlet	說明準噶爾為西北雄強部落,內部相互殺伐不止,大台吉車凌等人投誠,屢屢請求進兵,故於乾隆二十年出兵,俘虜準噶爾綽羅斯台吉達瓦齊,於太廟獻俘後,寬宥封親王,居於京師;其餘厄魯特人等皆居於伊犁等地種田,統於將軍。

乾隆朝《職貢圖》的西域成員構成與西征準噶爾後的西域表述

15	扎哈沁一旗	jahacin i emu gūsa	乾隆二十年，進剿準噶爾前，拿獲原先之準噶爾扎哈沁頭人庫克辛瑪木特，將其所屬二千餘口編作一旗九佐領。
16	烏良海十一旗	uriyanghai juwan emu gūsa	乾隆十九、二十年，往征準噶爾時，阿爾泰烏梁海頭人查達克，唐努烏梁海頭人圖布辛等率彼等所屬萬餘口投誠後，編旗佐，居於舊卡倫外。
17	哈密回子一旗	hami i hoise emu gūsa	康熙三十六年，哈密回子頭目額貝都拉歸附，因執送噶爾丹之子策布騰巴勒珠爾等人，編作一旗，授扎薩克頭等達爾漢。其三世孫玉素卜賜多羅貝勒封郡王品級，為哈密辦事大臣管理。
18	土爾番回子一旗	turfan i hoise emu gūsa	雍正十年，土魯番回子額敏和卓數次挫賊銳氣，授扎薩克，將所屬人等編為一旗管理，使戶口內徙遷居瓜州，為關展大臣管轄。
19	新投誠回子	ice dahame jihe hoise	平定伊犁後，乾隆二十四年，霍集斯、和什克等回子投誠，賜封王、貝勒、公、扎薩克台吉等爵，居於京師，為理藩院所管理。
20	平定回子	necihiyeme toktobuha hoise	平定西域烏什、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阿克蘇、庫車、沙雅〔爾〕、賽里木、關展、伊犁、庫爾勒、布固爾、拜、哈拉沙拉等十餘城回子後，補授阿奇木伯克等官，皆為欽差大臣所管理。



附圖1 〔清〕謝遂，伊犁群組，《職貢圖》卷，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引自Opendata開放資料：
<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opendata>（2026年4月7日檢索）。（以下《職貢圖》卷同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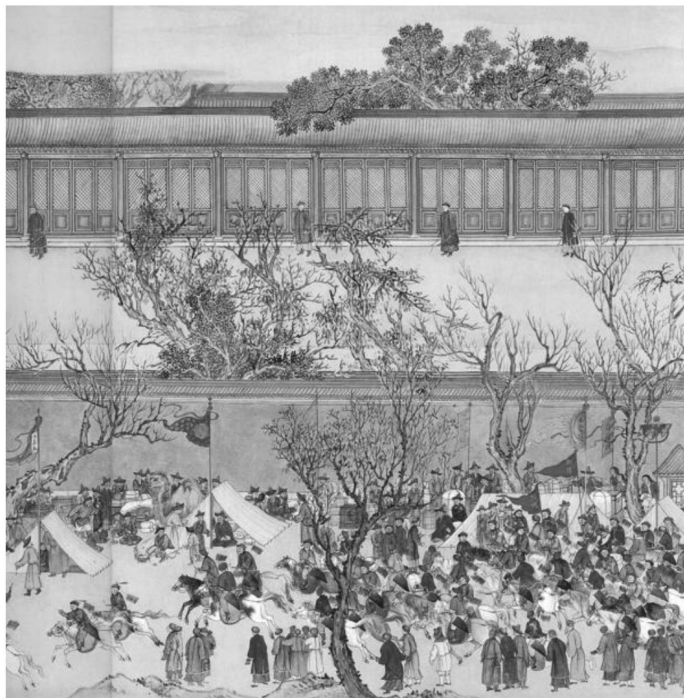


附圖2（左起）

2-1 〔清〕佚名，《萬國來朝圖》軸，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故6274，

2-2 〔清〕佚名，《萬國來朝圖》軸，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故6273。

兩圖引自賴毓芝，〈構築理想帝國：《職貢圖》與《萬國來朝圖》的製作〉，《紫禁城》，2014年第10期，頁64。



附圖3 〔清〕徐揚，《平定西域獻俘禮圖》卷，局部，收入易蘇昊、樊則春，《五臺山人藏：徐揚畫平定西域獻俘禮圖》。（以下《平定西域獻俘禮圖》同此）



附圖4-1 〔清〕佚名，《萬國來朝圖》軸，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故6271。



附圖4-2 〔清〕佚名，《萬國來朝圖》軸，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故6273。



附圖4-3 〔清〕佚名，《萬國來朝圖》軸，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故6504。



附圖4-4 伊犁（左：台吉；右：宰桑）〔清〕謝遂，《職貢圖》卷，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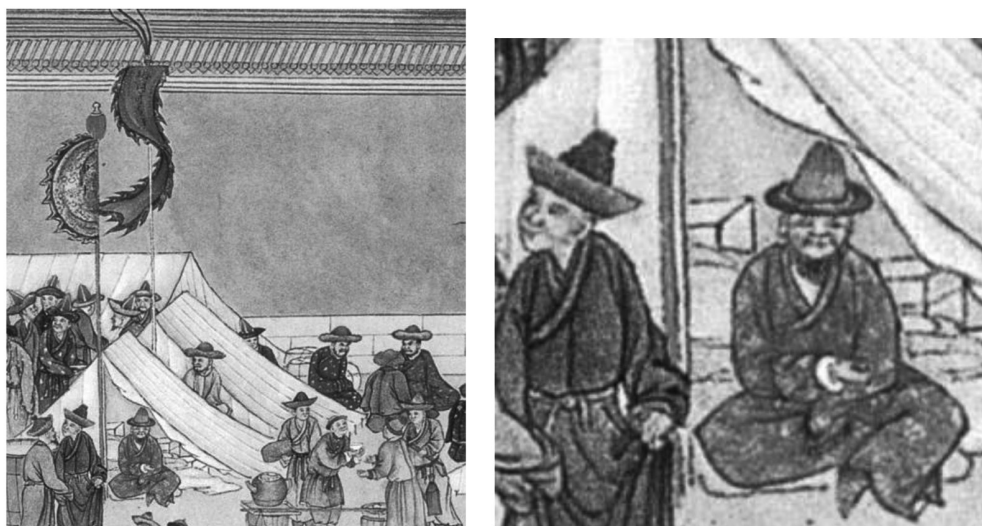


附圖5（從左到右）

5-1 烏什帽式近似厄魯特。〔清〕佚名，《萬國來朝圖》軸，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故6273。

5-2 烏什庫車阿克蘇等處回人。〔清〕謝遂，《職貢圖》卷，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5-3 烏什回人混用伊犁厄魯特帽式，伊犁厄魯特人的帽式帽沿稍有變化。〔清〕佚名，《萬國來朝圖》軸，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故62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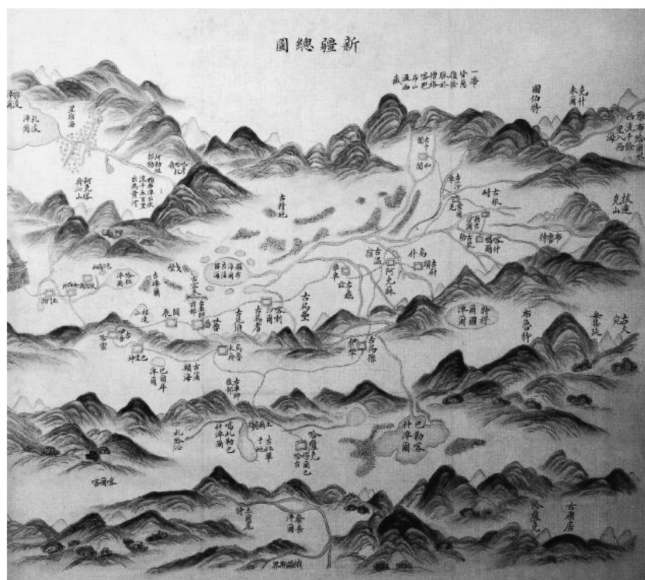
附圖6-1 左：伊犁（厄魯特）塔爾奇察汗烏蘇旗幟。右：伊犁厄魯特人。
〔清〕徐揚，《平定西域獻俘禮圖》卷，局部。



附圖6-2 （伊犁）塔爾奇察汗烏蘇等處回人。〔清〕徐揚，《平定西域獻俘禮圖》卷，局部。



附圖 6-3 伊犁塔蘭奇查汗烏蘇等處回人。
〔清〕謝遂，《職貢圖》卷，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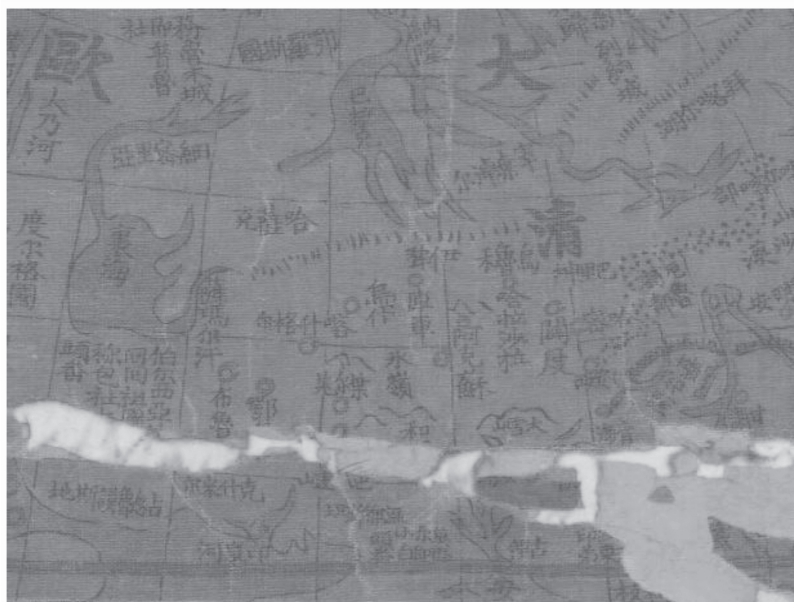
附圖7-1 〔清〕佚名，〈新疆總圖〉，《新疆圖說》冊，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收入陳維新，《失落的疆域：清季西北邊界變遷條約與圖特展》。（以下《新疆圖說》冊同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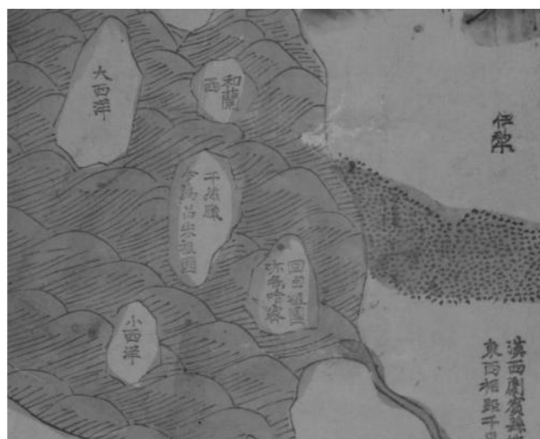
附圖7-2 標注阿勒坦郭勒、星宿海等黃河源。〔清〕佚名，〈新疆總圖〉，《新疆圖說》冊，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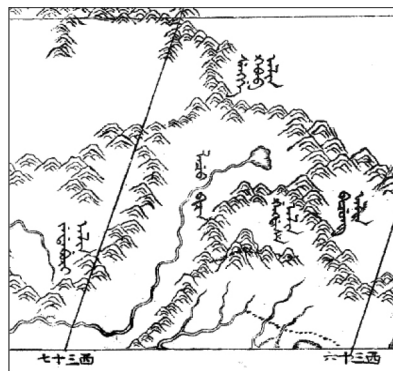
附圖7-3 標注雅布哈爾水、僧格喀巴山。〔清〕佚名，〈新疆總圖〉，《新疆圖說》冊，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附圖8 〔清〕莊廷粦繪製，《大清統屬職貢萬國經緯地球式》，美國國會圖書館地理地圖部藏，引自《數位方輿》，https://openmuseum.tw/muse/digi_object/56655a4f8a52bf967a0de609e51a2b4f（2022年5月20日檢索）。



附圖9 [清]佚名，《大清萬年一統天下全圖》，美國國會圖書館地理地圖部藏，引自《數位方輿》，
https://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map_detail.jsp?id=A103000047（2022年5月20日檢索）。



附圖10 g'angdisy alin(岡底斯山)。清聖祖敕撰，《康熙皇輿全覽圖》，五排六號，局部，收入汪前進、劉若芳編，《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



附圖11 [清]佚名，《伊犁與圖》，《新疆圖說》冊，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徵引書目

一、文獻史料

- 《內閣大庫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 《大清高宗純皇帝·滿文實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 〔唐〕閻立本，《王會圖》卷，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畫 00137900000。
- 〔清〕王杰等奉敕編，《欽定石渠寶笈續編》，冊 2，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冊 441，海南：海南出版社，2000。
- 〔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
- 〔清〕佚名，《大清萬年一統天下全圖》，美國國會圖書館地理地圖部藏，《數位方輿》
https://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map_detail.jsp?id=A103000047（2022 年 5 月 20 日檢索）。
- 〔清〕佚名，《新疆圖說》冊，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清〕佚名，《萬國來朝圖》軸，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故 6271、故 6273、故 6274、故 6504。
- 〔清〕和珅等奉敕撰，《欽定大清一統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74-48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 〔清〕松筠等奉敕撰，《欽定新疆識略》，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73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清〕祁韻士等奉敕撰，包文漢、奇·朝克圖整理，《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第一輯）》，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8。
- 〔清〕紀昀等奉敕撰，《欽定河源紀略》，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579。
- 〔清〕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記（外二種）》，北京：中華書局，2005。
- 〔清〕徐揚，《平定西域獻俘禮圖》，見劉如仲，《平定西域獻俘禮圖研究》，收入易蘇昊、樊則春主編，《五臺山人藏：徐揚畫平定西域獻俘禮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無頁碼。
- 〔清〕清高宗敕撰，〔清〕于敏中編，《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冊 10，《御製詩五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
- 〔清〕清高宗敕譯，《御製繙譯書經》、《御製繙譯詩經》，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185。
- 〔清〕清高宗敕撰，《御製詩文十全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3。
- 〔清〕清聖祖敕纂，《御製清文鑑》，清康熙四十七年武英殿刊滿文本，柏林國家圖書館藏。
- 〔清〕清聖祖敕撰，《滿漢合璧清內府一統輿地祕圖》，瀋陽：奉天故宮博物館，1929，據康熙五十八年（1719）銅版複製。

- 〔清〕清聖祖敕撰，《康熙皇輿全覽圖》，收入汪前進、劉若芳編，《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
- 〔清〕莊廷蓴繪製，《大清統屬職貢萬國經緯地球式》，美國國會圖書館地理地圖部藏，《數位方輿》，https://openmuseum.tw/muse/digi_object/56655a4f8a52bf967a0de609e51a2b4f（2022年5月20日檢索）。
- 〔清〕傅恆等奉敕撰，《皇清職貢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594。
- 〔清〕傅恆等奉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32。
- 〔清〕傅恆等奉敕撰，《欽定西域同文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35。
- 〔清〕嵇璜等奉敕撰，《皇朝通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42、643。
- 〔清〕溫達等奉敕撰，《聖祖仁皇帝親征平定朔漠方略》，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355。
- 〔清〕蔣廷錫等奉敕撰，《大清一統志》，清康熙二十五年敕纂，乾隆八年成書，乾隆九年武英殿刊本，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 〔清〕穆彰阿等奉敕撰，《嘉慶重修一統志》，收入《四部叢刊續編》，冊 99、200，上海：商務印書館景印，1934。
- 〔清〕謝遂，《職貢圖》卷，國立故宮博物院藏，Opendata 開放資料：
<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opendata>（2026年4月7日檢索）。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22、24-28、38、42、44，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二、專著

- 尤淑君，《賓禮到禮賓：外使覲見與晚清涉外體制的變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 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辦公室滿文編輯部，《北京地區滿文圖書總目》，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
- 江灝、錢宗武譯注，周秉鈞審校，《今古文尚書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 年二版四刷。
- 米華健（James A. Millward）著，賈建飛譯，《嘉峪關外：1759-1864 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
- 定宜庄，《清代八旗駐防研究》，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3。
- 武振華主編，《西藏地名》，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6。
- 馬大正、成崇德主編，《衛拉特蒙古史綱》，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
- 張永江，《清代藩部研究：以政治變遷為中心》，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1。
- 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
- 莊吉發，《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9。

陳維新文字撰述，李天鳴、林天人主編，《失落的疆域：清季西北邊界變遷條約與圖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0。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一版三刷。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冊4，北京：中華書局，1990。

濮德培（Peter C. Perdue）著，葉品岑、蔡偉傑、林文凱譯，《中國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歐亞與蒙古帝國的最後輓歌》，臺北：衛城出版／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1。

鍾興麒等校注，《西域圖志校注》，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

三、論文

孔令偉，〈拉達克與清廷情報文書的傳譯過程〉，《中國藏學》，2019年第3期，頁114-124。

孔令偉，〈欽差喇嘛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清代西藏地圖測繪與世界地理知識之傳播〉，《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92本第3分，2021年9月，頁603-648。

曲強，〈《皇清職貢圖》所見清朝對回疆地區的認知與書寫〉，《漢學研究》，卷44期1（2026年3月），頁71-98。

佟永功、關嘉祿，〈乾隆朝「欽定新清語」探析〉，《滿語研究》，1995年第2期，頁66-70。

沈雪晨，〈事實與書寫——雍正乾隆時期清準議和再論〉，《新史學》，卷32期4，2021年12月，頁181-240。

林士鉉，〈極東邊民——《皇清職貢圖》裡的庫野〉，《民族學界》，期45（2020年4月），頁107-158。

林士鉉，〈《皇朝禮器圖式》的滿蒙西域西洋等因素探究〉，《故宮學術季刊》，卷34期4，2020年9月，頁83-172。

畏冬，〈嘉慶時期《皇清職貢圖》的再次增補〉，《紫禁城》，1993年第1期，頁44-46。

馬子木，〈乾隆朝初通巴達克山考——兼論準噶爾遺產與清朝中亞外交之初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8本第2分，2017年6月，頁347-396。

莊吉發，〈謝遂《職貢圖》研究〉，《清史論集（二）》，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頁413-466。

郭美蘭，〈乾隆年間西北地方三次繪圖始末〉，《滿語研究》，2013年第1期，頁139-144。

楊揚，〈《廣輿勝覽》與《皇清職貢圖》的關係〉，《美術》，期666（2023年6月），頁110-117。

靳煜，〈清乾隆年間西域測繪再考察〉，收入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歷史地理》編輯委員會編，《歷史地理》，輯3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頁249-266。

靳煜，〈乾隆年間三次西域測繪再分析〉，《西域研究》，2016年第1期，頁27-34。

齊光，〈解析《皇清職貢圖》繪卷及其滿漢文圖說〉，《清史研究》，2014年第4期，頁28-38。

劉如仲，〈平定西域獻俘禮圖研究〉，收入易蘇昊、樊則春主編，《五臺山人藏：徐揚畫平定西域獻俘禮圖》，無頁碼。

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75，2012年3月，頁1-76。

賴毓芝，〈構築理想帝國：《職貢圖》與《萬國來朝圖》的製作〉，《紫禁城》，2014 年第 10 期，頁 56-69。

Hostetler, Laura. "Central Asians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Qing *Imperial Illustrations of Tributary Peoples*." In Nile Green, ed., *Writing Travel in Central Asian Hist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89-112.

Hostetler, Laura. "The Qing Court and Peoples of Central and Inner Asia: Representations of Tributary Relationships from the Huang Qing Zhigong tu." In Dittmar Schorkowitz and Chia Ning, eds., *Managing Frontiers in Qing China: The Lifanyuan and Libu Revisited*. Leiden: Brill, 2017, pp. 184-223.

Pegg, Richard. "Zhuang Tingfu: Cartographic Encounters and Echoes." Leventhal Map & Education Center at the Boston Public Library, July 30, 2021. <https://www.leventhalmap.org/articles/zhuang-tingfu/> (accessed July 12, 2026).

The Composition of Western Regional Entries in the Qianlong Court's *Illustrations of Tributary Peoples*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Western Regions after the Conquest of the Dzungars

LIN Shih-hsuan^{*}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first fascicle of the Qianlong court's *Illustrations of Tributary Peoples* 職貢圖, the present article examines the composition and ordering of entries concerning the Western Regions, particularly the pivotal position occupied by the Ili Oirat peoples and the Muslim cities of Huibu 回部, exploring how certain groups, which should in principle have been classified under the Eight Banners or the Qing dynasty Fanbu 藩部, the empire's Inner Asian dependencies, rather than tributary polities,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visual system of tributary representation. By cross-referencing the *Illustrations of Tributary Peoples* with other visual and textual materials, including court-produced materials, related maps of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Manchu-language documents, the Qing's reorganization of knowledge and territorial order in the aftermath of campaign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is traced.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presented Ili Oirat and Muslim cities had already become entries in the *Imperially Revised and Enlarged Mirror of the Manchu Language* 御製增訂清文鑑 under "Pacification of the Dzungar Oirats" 平定準噶爾厄魯特 and "Pacification of the Muslims" 平定回子, thereby indicating that their status had shifted from foreign or tributary polities to banner-affiliated and frontier-dependent subjects of the empire despite continuing to be arranged within the former. This "transgressive" form of compilation allowed the *Illustrations of Tributary Peoples* both to continue the tradition of tributary imagery and to document the pacification of the Dzungar peoples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Western Regions, marking a "Western Regions/Inner Asian turn" in Qing imperial representation. By magnifying the visual prominence of these groups and cities, the Dzungar Khanate was effectively erased as an independent political entity and historical subject, surviving only as internalized banner divisions and Fanbu categories within the territorial imagination of "China" and imperial memory.

Keywords: *Illustrations of Tributary Peoples*, Western Regions, Dzungar, territorial integration, Inner Asian turn

*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